

中日关系专刊

目录

老 杜：卷首语	1
信天翁：中国外交的日本新冲击（外一篇）	2
战争与和平：反日，另一场民族悲剧的轮回-致.....	9
东京博士：再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11
马悲鸣：靖国神社供奉的百分之百都是侵略者	13
王希哲文：关于当前国内反日游行情势的的参考意.....	15
苗 仁：中日间潜在的危险：所谓协防台湾	17
freiheitwilder：中日走向对抗 -	19
东海一枭：算历史旧帐，向恶邻索赔	25
有风就顶：中日贸易的实情-兼与老右商榷日本.....	32
鲁 肃：东亚问题杂谈-东亚各国对日本的历史.....	34
五骆驼：提上来，日本是中国屁股上的疼	37
信天翁：为什么要了解日本	38
邈邈道士：中日抗争的战略立场是一样的	46
根 源：替亲日右派说几句公道话	48
异乡客：千万不要在国内抵制日货!	51
bystander：我们为什么仇视日本?	53
马悲鸣：日本加害国应成立组织，联合对付小泉参.....	55
春秋战国：中日之间	58

启 明：中共到底要从“抗日”这头羊身上扒下几……	60
东京博士：了解一下日本民间的声音	63

卷首语

老杜

过去一月真是多事之秋，日本申请入常的消息，先事引来网上签名活动，最终在国内各地引发了反日游行示威风暴，中日关系骤显紧张。这一系列事件牵动了万万千海外华人的心。网站政治论坛里短期内便出现了大批精彩文字，令人目不暇接。限于刊物篇幅，这里只能收集部分佳作，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这场示威该如何定位？到底是义和团序的感性发泄行为，还是具有对国家利益具有某种程度的助益？在这个问题上，论者们可谓针锋相对。启明认为那是中共导演的丑剧，目的是左右两国外交，掩盖内政危机，信天翁认为这是“暴民外交”，不但不能达到预定目的，反倒会为国内原有的排外思潮火上加油，颠覆和平崛起的爱国战略，而邈邈道士、鲁肃等人则认为不能把这种爱国示威运动简单地比拟为义和团，认为它能为国家外交助威，王希哲更高度评价这场运动，认为它不仅是对日本的适当的警惕、批评和压制手段，更有利于唤醒民气，净化社会空气，是中国新的政治变化的准备。

作者们还对以反日示威为标志的中日邦交危机的深层原因作了探讨。大多数作者似乎都同意中日两国的关系紧张是国家利益冲突的结果。但对于目前的反日情绪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各家的意见分歧颇大。bystander、战争与和平、信天翁等人认为这终将伤害中国自身，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异乡客更具体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只会伤害中国自身利益，而邈邈道士则认为中日关系涉及台湾问题，而台湾问题乃中国根本利益所在，绝不能退让，王希哲则认为对日外交政策应该是两手的：适当的警惕、批评、压制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与日修好。值得注意的是鲁肃对东亚诸国人民反日的原因作了颇为精彩的具体分析，值得读者们细看一番。

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民间索赔等问题，论者们也各抒己见，提出了鲜明的看法，马悲鸣指出靖国神社供奉的都是侵略者，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应该联合对付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东海一棹呼吁算清历史旧账，向日本索赔，我觉得这些主张都值得进一步讨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网站的一个优势，是有许多日本在住的优秀学人，能根据大家的要求向国人介绍日本人自己的想法。无论我们对日本的想法和感情取向是何等分歧，尽可能了解日本应该是各家各派能够达成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东京博士、苗仁的介绍特别难能可贵，值得大家仔细阅读。

总而言之，本刊所收佳作甚多，论者们各自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并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证，可谓精彩纷呈。相信读者们通过观摩这生动的思想交锋，能对这场运动的原因、实质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作出自己的完美结论。



中国外交的日本新冲击（外一篇）

信天翁

最近网上为了日本加入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一事议论纷纷，据说国内还掀起了百万网人签名运动，而且获得了官方首肯，外交部发言人说那不是“反日情绪”云云。如此大事，老翁免不得应网友之请，发点票友议论。

一、日本变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本人上网，就是专讲包括连自己也不想听的大实话，此话尤其如此。但无论咱们感情如何，如果理智地正视现实，就会发现日本、德国变成常任理事国成员乃是迟早的事。

联合国从成立那天起，便是大国俱乐部，五个战胜国高踞其他成员国之上，不仅是类似美国大法官那种终身职务，根本不是选举出来的，而且具有一票否决权。世上不平等之事，莫此为甚。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其时苏东阵营还未出现，苏联觉得自己的盟国占有的席位太少，为了安抚苏联，英美便同意将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算成成员国，于是苏联一国便有了三票。70年代联合国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中华民国，苏联一家伙就投了三张赞成票。投赞成票的还有老牌修正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须知那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人家还这么干，让小芦看了报纸后暗自佩服人家毕竟还是讲原则的，不像后来中国什么原则都不讲，为了惩罚与台湾建交的某国，竟然动用否决权否决对该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而言之，联合国表面是个国际民主组织，但成员国之间根本就无什么政治上的平等可言，倒有点像个私人企业，谁的贡献大，谁说的话就更有份量，这似乎才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的按贡献分配原则。

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无非是沾了战胜国的光，中国尤其如此。如果不是抗战，则就凭咱们的国力，要想那位子根本就没希望。当初能进去，大半靠了无数阵亡将士的鲜血以及先总统罗斯福公和继任的杜鲁门公的提携，小半则靠了咱们臃肿虚弱的块头。

出于同样的历史原因，过去的强国如德国和日本都给人为地挡在外面了。这在开头倒没什么，可惜人家就是有本事，来了个凤凰涅槃（下为木），两国都卷土重来，在国际上重新充起大财东来。

这样一来就凸显了该组织的不合理。成员国的贡献是由金钱投入量决定的。不但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维持正常运转需要经费，而且组织的各种活动诸如派出维和部队、武器检查、人道救济等等全需要成员国掏腰包。中国历年掏的钱不但远远比不上其他常任

理事国，而且也比不上其他富国（例如所谓G 8——可不是网上骂人话）包括日本和德国。

这就形成了一种贡献与权力不成比例的状态，如同改革前的“海纳百川俱乐部”一般。鬼子对此已啧有烦言。我多次在美国《时代》杂志上看到攻击中国的文字，说论贡献中国最小，还毫无原则，出于私怨乱用否决权（上述那否决国际人道援助就是我从该杂志上看来的），云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和德国不但动不动慷慨解囊，而且积极履行配合联合国的决议，当然要获得良好的国际观感。须知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为数并不是很多，人家并没有咱们的世仇，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反对理由。更何况日本以其雄厚财力，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不容藐视的大国。记得90年代英国和日本发生贸易冲突，英国使节前往东京教训日本，不料对方却反唇相稽，说英国早就没落了，别以为自己还是昨天那个大国，没有资格教训日本，云云。由此可见人家信心满满，如果日本成心和联合国作对，起码要使联合国失去一个强大的财政支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际社会，日本象征着昨天的罪恶，而中国代表着今日的罪恶。中国的国际形像实在不敢恭维，丑得根本没法跟日本比，只能看着伊朗、北韩等国聊以自慰（但愿这些国家别再垮了，让中国失去难得的“陪衬人”），只是国人普遍不知道，还以为咱们比西施王嫱还美。因此，中国若要反对，不但缺乏经济实力的奥援，也唤不起多少国际同情（东南亚前受害国家除外）。

从这些角度来看，日本进安理会乃是迟早的事。说句让同胞刻骨衔恨的话：他们被挡在外面50多年，已经是很难得的奇迹了，这种好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例如不知道日本战争罪行的国家人民就会认为：难道50多年的惩罚还不够？

二、中国政府对日本的真正态度

中共其实从来不恨日本，恨的是美国。这原因很简单：美国外交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专门找中国的人权岔子，而日本是经济动物，没有西方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一门心思只想在中国发财，根本不管中国人死活。六四之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是最勉强的，谴责中国的声音也最微弱，解禁也最早，并始终没有接纳政治难民，跟台湾也差不多。

我党的外交是以本党划线，日本人如此包庇中国政府，又岂能不领情？当年战犯昭和天皇毙命，英国查尔斯王子原定访问日本，闻讯後立即改变行程，改为访问东南亚国家，而咱们却特地派出外长钱其琛去万里奔丧作孝子，当真是对战犯一往情深。後来平成天皇访华，政府还特地把那些主持民间索赔的仁人志士抓起来流放出北京，生怕他们去示威，也从不支持民间保钓运动，从来只限于发几个不痛不痒的外交部声明。

有的网友说，民间的仇日情绪是政府煽起来的，谬之极矣。我早向青年网友介绍过，我出国以前，我党历来只讲“阶级仇”，不讲民族恨，所有的仇恨宣传都是对着国民政府以及对有恩的前盟邦美国。日本鬼子只在文艺作品中扮演漫画角色，其功能主要是衬托国民党如何“卖国”。日本人究竟在中国犯下过什么罪行，谁都不清楚。连我这个有阅读狂的同志都两眼一抹黑，只是从父辈那儿受到感性教育而已。官方媒体从来只充满“世代友好，一衣带水”之类的无耻谎言。

刻下甚嚣尘上的仇日思潮，其实是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统治掀起的仇外思潮的副产品，根本不是原设计产物。原设计是针对老美而不是日本鬼子的。可惜仇恨一经煽起，便再也无法控制走向。中共的媚日外交并没有彻底抹去国民的记忆，而自动放弃赔偿更加深了国民的心态失衡。有趣的是，人民的这种失衡心态又感染了统治者，于是我党或多或少落入了“施恩望报反成仇”的处境中，对日本颇怀怨怼，但这和仇美心态相比，似乎有质的差别。

不管怎样，对日本申请加入常任理事国一事，我党决不会乐观其成。哪怕是傻如我党，也看得出此举必然改变中日两国的对比，以后中日之间不再是“常任理事国对普通成员国”的不平等关系，变成大国俱乐部的平起平坐的成员了。这如同过去的穷邻居变成了和你出入同一富人俱乐部的阔人一样，那心理怎么也难得平衡。

三、中国政府的可能应对

由老跛今日提供、经留日大仙翻译的信息判断，中国政府如果想反对，可以在修改联合国宪章时投否决票，即可釜底抽薪，断送东瀛春梦。

但很明显，中国政府不会采此对策——使用否决权一般必须非常慎重，何况此举必然引起强烈反响。如果大多数成员国赞成日本进入安理会，而中国动用了否决权阻断普遍民意，那反弹必然十分强烈，中国犯不上去干这种得不偿失的犯众怒的蠢事。

从官方目前透露的信息来判断，其实政府已经决意放弃抵抗，某发言人声称根据宪章，中国无法阻止此事发生，其实就已泄露了官方意图。不过，官方不大可能直截了当放弃抵抗，只会采用一贯的“婆娘外交”，亦即采取以下步骤：

A、不直接提此事，但通过媒体和官方声明抨击日本右派的翻案行为，捎带提一下钓鱼岛，目的是用市井婆娘指鸡骂狗的曲折方序，向日本宣示心中的不快。

B、默认和纵容一定程度上的民众抗议，对不会直接引发动乱的网上签名活动睁眼闭眼，目的是打“民意牌”，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但这一定会处于严格控制之下。

C、在联合国修改宪章以及投票选举日本为常任理事国时投弃权票，听任日本进入安理会。

我无法估计的，只是政府还会不会有个“D”，也就是通过这让步换取日方经济让步。不过如果是李肇星作外长，他那类人猿的脑袋未必会想到这上头去。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对策，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的结果。我早多次警告过政府，不要玩“民族主义”这把火，否则只会烧到自己头上来，重演30年代激进的民众与谨慎的政府对抗的悲剧。事情明摆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而且日本人迟早要进安理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有弊无利，还不如接受现实拉倒。

但如果真这么干，岂不是戳穿了“三个代表”的谎言，暴露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相？闹半天，敢情只敢对一衣带水隔开的炎黄子孙台湾同胞发威阿？怎么专门跟英国鬼子倒着来？人家是自家人要独立从不镇压（北美除外），但如果外国打进来则绝对不轻饶（例如与阿根廷为福克兰大打出手），咱们则是钓鱼岛宁赠友邦，台湾岛不给家奴！

所以，戏么，还是要演一下的，一则向日本人宣泄一下弃妇情怀，一则让国人看看，政府已经尽到全力了，实在是无法违反宪章，须怪不得我党。

因此，消极贤甥担心国内会因此大闹，我看这可能性很低。国人讲究的是“安全爱国”，没有政府默许，一般是没那胆子去举行示威的，要不六四也就白开枪了。

四、我的建议

愚以为，搞那些“网上抗日”，什么鸟意思都没有，默许或纵容暴民示威更是扯淡，这只会败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反倒刺激起日人的逆反心理。别以为可以赖到“公民言论自由，政府无从干涉”上去，人家知道您那儿是什么国家，还没傻到您想像的那地步呢。

话虽如此，我充分体谅政府苦衷——自家酿就的“爱国主义”苦酒，当然也只有自己喝下去。不过，以后趁早还是逐渐淡化“爱国主义”宣传，免得日后backfire，在老百姓心目中再度制造“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错觉，弄出个“逼共抗日”的闹剧来。

另外，此後拜托把民间和官方真的分开，例如民间索赔、保钓之类的活动，政府根本不宜骚扰阻拦压制，也好让百姓有个恢复心理平衡的机会。如果不是以前官方主动放弃索赔，此後又千方百计压制民间索赔，百姓的怨恨又何至于积压到今日不可收拾的地步？

至于如何处理日本进入安理会的问题，我的意思倒和中央一致：那反正是阻挡不住的，而且良好的中日关系确实为中国腾飞所需，但先总统蒋公有言：“牺牲未到最後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放弃未到最後关头，绝不轻言放弃。”政府如果真的以国家利益为念，就该利用此事，狠狠地敲小日本一竹竿。

最佳策略，莫过于在幕後交易，狮子大开口，用同意日本进入安理会来换取他们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这当然作不到，因为人家是民主国家，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样，可以背着人民任意拱手出让大好河山，所以，那不过是漫天要价。真正的要求，还是巨额经济援助。我党应该像活跃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的车匪路霸学习，发扬那些人的豪勇，请日本鬼子捧上白花花的大把银子，乖乖交够买路钱，否则咱们就要动用否决权，在修改宪章时否决动议，让他们望着安理会大门干瞪眼，过尽千帆都不是，肠断东瀛洲。

中日交恶势必破坏“和平崛起”的爱国战略

一、什么是“爱国”？

“爱国”如今成了中国人争吵最厉害的一个话题，这在其他民族大概还从未有过。更荒谬的是，无论是哪派中国人，都根本说不清这“爱国”究竟是什么乌龙。“爱国”

似乎成了人体肾上腺功能之一，衡量尺度似乎就是看谁的口号喊得最响、口水喷得最多。根据这一道理，刻下的反日示威，自然也就无可置疑地成了“爱国运动”。

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所谓“爱国”，就是“看到并力争全民的根本利益”。

以此定义分析，无论是中国政府，是拥共派，还是以所谓“民运”分子为代表的倒共派，全都不是爱国者而是害国者，从来就没看到并忠于全民的远期利益，其中热衷于“阶级分析”学说的毛共遗孽如“民运”垃圾者，甚至连世上有超阶级（包括统治者和人民在内）的全民利益都不承认。

同样地，以此定义出发，可以判定，胡中央提出的“和平崛起”口号，确实符合中国的全民远期利益，应该视为爱国战略。不幸的是，这只是口号而已。中共一如既往，并没有把自己向全民乃至全世界提出的战略口号，当成必须剑及履及的神圣誓言。刻下由官方默许的反日示威活动就是生动证明。

二、中日争端的真实原因与实质

在真正的爱国者看来，国际争端应该反映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中国政府真是爱国政府，就应该代表人民去向日本人争利益。如果为此与日本起了冲突，那起码还在动机上是无可指责的，可以批评的也就是外交专业水平。但以本人看来，似乎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已经有网友指出了，中日两国政府争端之起，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日本政府未就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也不是为了修改教科书，更不是为了什么参拜靖国神社，而是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含混地授权日本介入未来的台海战争。这才是真正惹恼了中国政府的大罪。

如此看来，如果日本政府修改了该条约，明确规定即使美国介入台海战事，日本也不参与，那么，眼下笼罩在中日两国上空的阴霾立刻就会云开雾散。为了这一目的，中国政府竟然不顾玩火自焚的巨大风险，效法慈禧太後老佛爷，以为“民心可用”，轻率地打出毫无实际意义的“民意”牌来。

这算什么狗屁“爱国”？中共作为抗日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对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战祸，从来就不放在心上。因为担心自己与日寇勾结夹击国军的丑事暴露，中共从来压制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调查研究。对日本人占领了中国领土钓鱼岛，中共不但不敢去为全民据理力争，反倒压制民间保钓运动。真正事涉全民利益之时，中共从来噤若寒蝉。如今只因为日本人有可能妨碍中共的大一统迷梦，便不惜干出伤害全民利益的烂事来，蓄意破坏中日邦交！

说到底，中共的所谓“爱国”只有一条，便是“不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而所谓“中国内政”，也就是中共政府对人民以及“藩属”如台湾为所欲为的权力。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做到这条，对中共胡作非为眼开眼闭，则中国政府一定会牺牲全民利益去讨好笼络。

正因为过去日本人从不对中国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政府才会奢谈“中日友好”，压制民间索赔运动。无奈人家日本政府可是真正的爱国政府，出于日本的战略利益将美国奉为上司，并把“周边”的台湾看成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所在，这才开罪了中国政府。如

果台湾不存在，则哪怕日本吞并了钓鱼岛和东海、南海未被中共控制的广大海域，则中共政府也绝对不会吭一声气。

如果有哪位爱国同志不同意我这分析，那就请他上来给咱们讲讲，为何中国要主动放弃对未占领的南海诸岛周边的广大海域主权，竟然对周边国家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卖国建议？为何中共政府对争回钓鱼岛兴趣缺缺？须知那些海域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中国乃是资源小国、人口大国，任何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都只会把眼光放在那些地方，而不是为了统治者的面子去和邻居争闲气，还竟然为此把全民经济利益坑进去。

三、战争必然导致中国解体

我在楼下看见有的网友说什么“中日必有一战”，谬之极矣。

早在近五年前，我就在《为什么要了解日本》中指出，地缘政治决定了中日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是千丝万缕的，两国之间绝对没有什么轻易的“友谊”可言。但那篇文章没有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内容也彻底更新了。例如中东跟美国相距万里，但老美仍然要万里兴兵上那儿去抢夺能源控制权。这就是说，地理距离已经不再是构成两国利害冲突的唯一因素了。

另一个问题是，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利益冲突乃是下下策。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科技发达造成的大规模毁灭武器出现，使得战争手段无法起到争夺世界或局部霸权的作用，只会让交战国两败俱伤。例如英国原是世界领袖，但在二战惨胜後全国经济崩溃，就此失去了世界大帝国，沦为美国的小走卒。

另一方面，由美国带头打破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为没有军事实力的小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遇。不仅日本和西德在战後实现了这种和平崛起，就连毫无军事实力的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香港、新加坡也如此。

因此，同志们必须看到，以武力作为解决两国间利害冲突的手段，以建立军事基地作为本国经济利益保障，乃是早就过时了的地缘政治方略，当年德国日本想效法大英搞这套都碰了壁，何况是今日中国？

更何况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日本当然构成挑战，但也提供了无数商机，他们没有能力压制中国的崛起，却有一万条实际理由利用这种崛起。中日之间无法避免的冲突主要是资源争夺。除此之外，中日之间完全结成共存共荣、相互受益的战略伙伴。李光耀那糟老头子的脑袋早就僵化了，我党领袖万万不可听他胡说八道。

我早在5年前写的反战系列中就多次反复强调指出，什么是纸老虎？中国就是纸老虎！当今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危如累卵，根本就没有开疆拓土、建万世不拔之伟业的底气。对外兴兵绝对是中国政府的自杀行为，势必引起国家崩溃，政府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少数民族地区分裂出去并出现前南斯拉夫那样的“种族净化”。如果中共真想自杀，当然谁也拦不住，不过犯不上把全民拉进去作陪葬。

在此後论述台湾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文字中，我又指出，维持不统不独乃是符合中、美、台两岸三地的共同利益的最佳决策。以大陆而言，最聪明的战略便是尽量发展两岸关系，用经济纽带把台湾捆死在大陆上。这是民进党政府根本就无从防止的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不久前大陆对台湾某商界巨头实行经济讹诈，逼使他改变了支持民进党的立场，就是这一战略取得成功的最有力证明。

不仅如此，我还多次指出，不统不独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绝对不会听任台湾取得名义独立。而只要美国不支持，台湾就绝对没本事悍然宣布独立。不久前台湾国防部长公开承认，如果没有美国全力支援，大陆若发动攻击，台湾顶多只能顶两周，等于坦承台湾独立完全得靠美国人鼎力相助。但老美绝对不会这么作。

所以，我党必须看穿，阿扁的独立秀只是“出口转内销”的国内党派政治诡计，根本没有现实可能，不过是借力打力，让中共那举世无双的冤大头倾举国之力帮助民运党赢得民心而已。奉劝中共停止庸人自扰，为人所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被人愚弄次把不难，如我党那样，在国际舞台上一辈子被人愚弄，绝对没本事愚弄人家，那才是最难最难的阿！

因此，从现实情况考虑，中共必须彻底放弃武力征服台湾的梦想，并打消全民这种梦想，争取在实现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就是全民包括我党必须追求的战略目标，任何偏离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政府行为都必须严加谴责。

由此看来，如今中共实行的“婆娘外交”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只会破坏中日的经济合作关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蠢事。请问中国政府这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难道是迫使日本政府修改安保条约，发誓不介入台海之争？就算达到了这目的，你们有本事让老美也作出类似承诺么？难道没有日本协助，老美就不能军援台湾了？而如果有老美协助，速战速决就没了把握。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们敢行此大险去打台湾，招致巨大人命财产损失和国际经济制裁，导致虚弱的经济垮杆，引起全国大乱，贵政府被军人野心家推翻？

总而言之，奉劝北京政府早日睁开眼睛看清国际大势，停止实行婆娘外交，罢免痞子外长，老老实实向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府外交学习，实行“去痞子化”的痛苦改造过程，力争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专业水平。



反日，另一场民族悲剧的轮回—致政权和政治反对派

战争与和平

1900年，释放了潘多拉盒子的满清政权，无知的利用义和团的民意，为自己日渐颓弱的政权助威；丢失北京後，又无耻的把刀头转向义和团的民众，以挽回无序的秩序。一场“八国联军”的入侵和对义和团民众的屠杀，彻底打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奠定了中国20世纪血染历史的开端。

1905年同盟会成立，借助国内日渐升温的反清反帝情绪，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暴力革命口号，凝聚了那一代人的巨大民意，把中华民族彻底的推向了暴力和鲜血的黑暗深渊。

政权的无知和无耻在先，政治反对派的有知和无耻在後，一起用政治加暴力的手段，把中国带进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战乱的阶段”（路透社在报道宋美玲去世时的用语）——20世纪。

战乱和动荡的社会，种下了野蛮的种子，生长了血腥的大树，收获了流氓的国家。

一场又一场风云激荡的革命，既驱除了传统文明更阻隔了现代文明，数代人生长在荒凉的战场，在尸体的课桌上，白骨的课本中，学习着血写的历史，并成长为流氓政权和反对派一代又一代的炮灰和奴隶。中国社会和国民在血与火中被蹂躏、被践踏；中国大地变成了远离任何文明的丛林之地。

政治和革命，本是文明社会中少数人激情的鸦片，大多数人原本可以远离它，在文明的其他角落里，寻找合适的自我空间；而20世纪中国历代政权和大多数的政治反对派，都不惜绑架全体国民，将其投入到那血与火的熔炉中，维护自己的政权或奠基未来的政权。

失去平衡的极端民族主义，加之政权和政治反对派的充分利用，打断了满清以来中国近代化可能的前进道路，劫杀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

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一代政权，将中国社会带出了丛林的沼泽，带进了重返文明的道路。20多年来，虽然发生了“六、四”这样子颠覆文明的事件，但中国终归走在重建文明的道路上，既有传统文明的恢复，也有现代文明的引进。

民族主义强大的号召力和宗教信仰的狂热，决定了它是一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今日海内外华人同声一气的对日声讨，可见一斑。但它的天性不过是情绪表达并相互渲染的结果，而非理智、平衡和妥协的结果，因此，也就决定了民族主义力量的双刃性，既可能是杀敌的武器，更可能是自杀的工具。

政权和政治反对派杀敌也罢、自杀也罢，本无须旁观者多言，但他们的无耻在于：他们的杀敌，用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下的百姓作武器；自杀，则劫持了民族主义情绪下的百姓一道殉情。更糟糕的是，失去平衡的民族主义，颠覆了社会应有的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颠覆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道路。

20世纪初，满清为20世纪的政权们开了一个极坏的头；孙中山为20世纪的政治反对派们开了一个极坏的头。中华民族在政权和政治反对派的交互厮杀中蒙难。

21世纪初，今日的政权打开了文明的魔鬼的牢门，反对派却像迎接战友一样隆重欢迎；难道，这21世纪，会是另一场民族悲剧的轮回？

作为20年前的反日青年，我的反日情绪和历史，决定了我比今日的政权和政治反对派们对当年日本入侵中国有更强烈的愤怒感，更别提今天街市上游行的“愤青”了；但情绪归情绪，理智归理智，对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认可，我不得不再次提醒政权和政治反对派们：

不要劫持普通民众，不要劫杀社会文明！



再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东京博士

某网民向我提问如下，在此我专门开新帖回答——

请问博士，有一种说法是说小泉首相之所以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保证不再有战争，也是对战争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我宁愿相信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理解的误差。中国人认为首相参拜伤害了感情，但是如果按照首相的角度思考，其实也挺好的。就像每一个德国总统（是总统，不是总理，德国总统是国家元首，并没有实权，和日本天皇是一样的，只不过不是世袭）每年都要给犹太人的墓下跪一样。都是忏悔的方序，没什么不好。还有一点，所谓的历史问题，一直在纠缠，难道真的没完没了了吗。没有人能够改变历史，承认它也好，不承认也好，但是我们都是面向明天，面向未来的。一直在回忆着痛苦的过去，有意义嘛。

东京博士答——

我谈谈个人这些年在日本看到的听到的日本的民间的声音以及各种媒体对政客的有关参拜靖国神社的感想——

1. 靖国神社本来与其他众多的神社一样，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活动，靖国神社建立当初是为了纪念卫国捐躯的人，当时是等同于为天皇而死的人，战後在美国的强制下该神社作为政教分离，成为完全的民间宗教法人，日常营运资金主要依靠民间团体和个人。

2. 由于日本的近代史上除了内战的死者（规模根本不能与中国比），大多数战争都是与外国有关，日本在地理上几乎很少有外敌入侵，因此可以认为与外国的战争大多数属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因此大部分祭奠在靖国神社内的灵魂大部分也是这些战争中的死者，当然还包括战败时不愿做亡国奴而自杀的非战斗员。

3. 日本民间对死者祭奠的文化传统中确实有不管生前此人好坏，死了到了它界都平等，罪恶也就清了，因此日本没有鞭尸特定的古人的文化（批判某种思想是另一回事）。人死了以後他的遗族後代中国和日本都有祭奠的自由（比如中国被枪毙的人他的家族每年上坟并不犯法也不受道德谴责），问题是战犯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靖国神社的名称顾名思义就是与国家有关的，这与个人的文化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反对或主张参拜靖国神社要慎重本身，就说明了日本人也知道这些道理的，既然平民能够懂得这些道理，那么具有常人以上的智力的政客完全也懂得这些，因此对政客，乃至一国首相而言，无知，失误，这些都是解释不通的，反之也可以说都是有政治意图的，尤其是公序参拜。

4. 根据以上所说，小泉也好，以前的首相参拜问题也罢，靖国问题已经完全成为被政治利用的道具，祭奠活动本身的意义已经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我上面的1和2的说明，作为神社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地人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根本不能成为开脱的理由，简单

地说，首相+靖国+过去的对外战争，无论如何不能用内政+文化来解释的，内政的含义我理解是内部政治，问题是这个靖国涉及的内容并非内部，战犯不是内战而死，死刑判决都是外国人，怎么个“内”法？

5.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就不难理解小泉嘴里无论说什么难听话还是好听话，目的只有一个，维持自己政客的权威形象，一个施政者说一不二的才是小泉的真正性格，这个在我以前的那篇《Never give up!》文中已经说过。正如这次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昨晚日本媒体记者问小泉如何考虑，他回答“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采取对今後的日中关系的友好发展没有障碍的对应”，我个人认为这些不都是您造成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所以在我眼里小泉的对中国游行发言也好，对参拜靖国的动机是否真的是为了祈祷不再战争，这些都已经是不重要的，无非是一个政客的作秀而已，历史上被政治翻弄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日本人，因此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是日本人的课题，对信息自由和独立思考环境远远不如现在的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分析。



靖国神社供奉的百分之百都是侵略者

马悲鸣

有人说，因为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了七名甲级战犯，所以其他日本加害国的人民不能容忍。只要把这七名战犯的牌位移出神社，日本首相就可以参拜了。

其实不然。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不仅仅这七名甲级战犯是侵略者，而是所有两百万战死沙场者，包括两万九千名台籍日本兵和两万一千名韩籍日本兵，无一不是侵略者。

很简单的道理，日本在二战败于美国之前的历史上，不曾遭遇过任何入侵，故在美军空袭日本本土之前，日本不曾有过卫国战争。而美国空袭日本乃是对其偷袭珍珠港的报复，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延续。只不过战线由外线作战逐步转为内线作战而已。故所有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战死沙场的军人，无一例外都是侵略者。

日本靖国神社平时不对外开放，只在门口立一比棺材还大的大木柜，供参拜者礼拜之後投币捐款之用。神社大院里有日俄战争博物馆和日清战争博物馆。日清战争指的是甲午之战。这两仗都是日军的海外作战，都非卫国战争。日本都无遭受入侵的危险。其中甲午之战的战场在朝鲜和中国威海。日俄战争的战场在中国东北，以旅顺攻坚最为惨烈。这些战争博物馆宣扬的自然都是皇军神勇。

靖国神社大院里不时有人立起诸如“航空幼校死难者纪念”墨迹竖书的白幡，组织各种纪念活动。航空幼校大约是二战末期的日本幼年航空学校。青壮年都战死沙场了，航校只好征少年。或许是少年航校学员经验不够而被美军击落，或者是航校遭美机轰炸而遇难。这些空军幼校学员如果以1945年15岁计，若还活着的话，大概也得75岁了。

因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旷日持久，几乎每天都能找到某次战役、战斗的纪念日。故靖国神社大院里这种民间纪念活动终年不断。每逢八一五等大的纪念日将临之际，靖国神社门外的电线杆子和栏杆柱上都会贴满终战纪念集会的海报。

日本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险遭入侵，是元朝蒙古军团跨海远征。不料未知气象，被海风吹败。日本认为这是神风相助，便将“一架飞机换一艘航空母舰”的自杀序飞机命名为“神风突击队”。在空军各机场的招募告示上都写明，参加神风突击队的成员生还概率是零。

其实蒙古跨海远征军的失败不在神风助日本，而在蒙古军战前没有向当地海岸渔民仔细询问海上气象情报。当初成吉思汗所向披靡，是靠了广派斥侯（探子），收集所要攻击目标城镇的详细情报。再根据这些情报周密部署战斗序列。正所谓“知己之彼，百战不殆”。成吉思汗大军里携带着道教全真派道长丘处机等人参谋军机。但后来成吉思汗死了。蒙古军团便慢慢放弃了这种临事以敬，详探敌情海情的优良作战传统，难免不遭遇海难而全军复没。

后来康熙攻台用的海将施琅知海，便未遭海难，一鼓而下澎湖，逼降台湾。

日本历史上固不曾遭遇过入侵，便不曾有过反侵略的卫国战争，尤其在明治维新以後的近代。故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的，自明治维新以降的所有战死沙场的军人，全部都是侵略军。包括韩籍和台籍日本兵。

即使挪走了七名甲级战犯的牌位，靖国神社供奉的仍是侵略战争的死难者。日本政府阁员的参拜，仍是以日本国家的名义否认这些对外战争的侵略性。

唯其不信，感兴趣者可去靖国神社大院一旁的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博物馆，去看看那里的陈列，便知端倪。



关于当前国内反日游行情势的参考意见提纲

王希哲文

近日，国内各省多位朋友来电询问，对当前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我们的同志应采取何种立场态度的问题。目前我不担任任何民运组织的任何正序职务，仅将个人意见提纲简复，供朋友们参考。

一、中国必须对日本保持警惕

1、日本对二战的战败投降，是不甘心的，特别对中国是不甘心的。

2、钓鱼岛还不是中日之间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台湾。长期以来，日本是台独的策源地和幕後牵线人。近二十年中国国力日趋强大，特别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後，日本感到它躲在幕後，单凭台湾台独的力量站在台前，台独的希望已近乎断绝了，它近期的内外国策急剧右倾化动向显示，它已经迫不及待要站到台前来，直接干预中国的台湾问题了。

3、二战德国的希特勒纳粹政权，已经为承担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行为而死亡。今天的德国政权，历史法统已经不是第三帝国政权的延伸。但日本不同。应该为对亚洲、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家行为负责的是日本天皇和天皇制度。战後的日本虽已改造成了一个准民主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仍然保留了天皇的法统，它在国家人格上，仍然是发动对华对亚洲战争那个日本帝国的历史延伸。太阳旗仍然飘扬。它没有因承担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行为而死亡。但因为如此，现日本国家就要背负起二战战争罪行的责任，这对日本民族来说，是一个使他们永远无法抬起头来的“历史问题”。他们要最终抬起头来，他们就一定要竭力去翻掉或尽量翻掉二战战争罪行的案。站在日本民族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

的。但我们又不能站在日本民族的立场而必须站在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中国的立场。矛盾就在这里。

4、虽然日本翻二战的案，目前主要矛头还不是向着美国。美国可以装看不见，但任何翻案，都必然带着骨牌的性质。牵一发动其馀，而最终必将翻到美国的头上。这是美国也决不愿意看到的。何时需要悄悄的镇压住日本，美国心里有数。

因此，压制住日本最近右倾的气焰，揭露其开脱自己历史罪行，阻挡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别不允许其成为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是符合中国国家长远利益的，也是能够得到亚洲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默许的。

二、中国应该对日本努力修好

1、既然战後的既成事实，旧日本没有如德国一样因战争罪行而灭亡，它延续了下來。那么，除非谁也不愿看到的中日再战，你死我活，中国只能面对现实，既对日本保持警惕和批评，又要努力与日本修好，睦邻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

2、实事求是的说，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也存在着强大的对华友好的力量。在他們和中国人民共同的推动下，中日经济关系愈趋紧密，中国经济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帮助（你把它理解成对中国的变相补偿也行）。

3、在反对日本干涉台湾问题和警惕其为二战罪行翻案的前提下，一个繁荣强大的东北亚经济圈的形 成，也有赖于中国韩国等与日本的修好。

因此从中国和亚洲的利益出发，对日外交政策应该是两手的：适当的警惕、批评、压制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与日修好。

三、对当前国内反日浪潮我们应持的态度

1、支持、参与各地学生青年和市民的反日示威活动，但反对过激口号和行为。

2、虽然这次反日浪潮确是中共政府默许，操控的。但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示威活动，毕竟是对重新唤醒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青年64後被摧残殆尽的民气有利的。对净化自私自利不问国事的社会空气，也是有利的。

3、政府操控的任何社会示威政治运动，都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一轮的民主自治的思潮，必将再次激发起来，活跃起来。新一代的活动家，也必将在它中间诞生出来。这一切正是中国新的政治变革的准备。但我们的朋友切不可着急，慢慢来。

4、这对胡温集团也是考验。如果他们真是为国为民，不希望中国沉沦下去，腐败下去，他们就应该爱护和扶植中国民间的民族正气和民主民气。他们不应该如邓小平陈云等老官僚那般对中国人民民气的聚集有着惊弓之鸟般的“文革过敏症”恐惧；他们应该多少借鉴毛泽东在人民运动面前的自信心，如果他们确信自己的政策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仅供参考

2005年4月5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中日间潜在的危險：所谓协防台湾

苗仁

作为一个打工仔，一直是奉行多看少说的原则因为出生在中国生活在日本，总免不了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关心其中最大的担心就是台海万一发生战争，如果米军卷入的话中日之间几乎肯定会发生军事冲突。

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协防台湾”，下面就来解释一下这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俺的粗浅认识。

其实“协防台湾”的说法，并不准确具体的说是：日米安全保障条约有关“周边有事”的新方针(原则)原型是1978年日米防卫协力方针(Guideline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规定：

- 1, 防止可能的侵略的态势。
- 2, 面对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对策。
- 3, 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日本以外的远东形势变化时，互相协作。

本来针对共产圈势力的第3项，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後的90年代重新给与乐定义。在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首脑会谈发布了“日米安保共同宣言：目标21世纪的同盟”(U.S.-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主要内容是：

- 1, 日米安全保障条约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亚洲太平洋地区。
- 2, 修改1978年缔结的日米安保协力条约。为应付日本周边有事(周边事态)，建立两国的协作关系。在1997年9月推出最终报告“日米防卫协力方针”(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就是所谓新方针。

新方针中最受争议的“周边有事”部分，“周边事态”发生後，日本必须支援米军的军事行动。其内容是：

- 1, 在非战斗区域进行救援难民对应，搜索救难，自国民救出活动，非战斗员退避，海上船只检查。
- 2, 提供自卫队设施，港湾，机场等设施，在补给输送整備卫生警备通信方面，给与米军以後勤支援，包括武器弹药的运输支援和警戒排雷海空域调节指挥。在中国政府的抗议下，日本政府的正序说法是：周边并非是地理概念，根据是否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判断根据。

记得当时小泽一郎演说的时候批评说：“周边”不是地理概念的说法，简直是巴

嘎。“周边”当然是地理概念。重要的是，对米国，日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明确。。。

这样的大实话，北京听得不舒服，宁愿作鸵鸟听桥本龙太郎的胡话，给随后来访的小泽一个闭门羹。

客观的看，这条表面上针对韩半岛其实针对台海的“新方针“，将使日本在米中的军事冲突发生时，自动加入米军一方参战。前段时间看的报道节目中正好提到这问题，其中众议院议长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河野洋平的儿子众议院议员河野太郎也说：日本对米军进行後勤支援，就是参战，现代战争没有什么非战斗区域，前方後方战端一开，中国就会攻击在日本的米军基地和日本的後勤支援部队(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如此吧)。

俺这样的升斗小民，只想挣钱糊口过小日子，可不愿意莫名其妙的给飞来的导弹砸死，没有本事排解这样的危险，只有祈望台海不要开战，即使开战米军也不要卷入，即使米军卷入日本政府也不要履行诺言(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中日走向对抗——历史的使然！！

freiheitwilder

看了论坛上许多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大多是“文人”之作，都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和为贵，仁者无敌），对比70年前欧洲的“绥靖主义”，会发现异曲同工之妙。

当今世界，美国独大。中国，德法，俄罗斯，日本则各怀心思。资源，能源是大家争夺的对象。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演义出36计。

一国内政治

偶一直佩服小平，真一代伟人。韬光养晦的发展政策，独具慧眼地点将江泽民,胡锦涛为其理想的继承人。如同大汉时期的萧何和曹参。遗憾的是，眼光只能管两代。江的“无所为”之于“萧规曹随”；胡的“有所为”实乃“迫不得已”，乃自身发展趋势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看看，胡的西藏经历就知道此公乃棉里藏针。哎，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其双面性，对国内民主杀伤太大。

二中日冲突的必然

日本是一个以电子产品和机器工业为其生命的国家。日本崛起，西方惊讶地发现厂房里整齐的流水线，高自动化的流水作业。

在中国改革之前，日本仅仅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而自己还可以担当亚洲的经济领袖，还可以把中国培育成自己的市场，而现在，发现“狼来了”——一切都是“一厢情愿”。

1，德国联邦对外经济代办处专员在会上以数据和图表显示，中国已于2004年取代日本，成为紧追德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如果把数据进一步落实到电子产品上的话，那么，最近二十年里，在电子产品出口美国业务上，日本损失了约30%的市场份额，而中国则增加了30%以上的市场份额。（来源：德国之声）

日本向来对向中国进行的技术严格把关，核心技术从来都是禁止之列。反观欧洲，为了换取中国的市场，出手极其大方，尤以德国为最。最近一例，空中客车对中国进行飞机机翼技术转让。当然，还有一个次要原因是，欧洲的产品面临美国，日本的挤兑，急需一个经济，政治上的盟友，让中国当先锋。

2，就美国对外贸易而言，中国所占其比重上升并且已经超过日本。就日本对外贸易而言，中国所占其比重上升并且已经超过美国。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日本所占其比重下降。这里有一组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

2004年美国对中国贸易（单位百万美元）：出口34,721.0 进口196,699.0 平衡-161,978.0

2004年美国对日本贸易：出口54,400.2 进口129,594.7 平衡-75,194.5

当然，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附加价值低，不过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日本是致命的。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一切以利益为基础。当日本对美的贸易下降到台湾与美国的程度时，日本的命运可想而知。

3, 中日石油，钢铁，造船的冲突。

石油，日本在即将成功的中俄石油管道上半路杀出，成功地离间了中俄这对战略盟友，狠狠地在中国背後捅了一刀。这个痛啊，对中国是致命的，没有俄罗斯背後狐假虎威的军事支持，中国何以应对美国的逼宫？

因此就有了中国强硬的东海石油开发反报复。有趣的是，当初联合开发的还有美，英，荷公司，不过在日本的要求下，都撤出了。其中背後又有没有什么秘密？是美国阴谋成功得逞，抑或其它？

产经新闻：中国期货交易量超日本居亚洲首位。日本从事商品期货交易的业务者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担心“如果中国开放（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话，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从日本市场上夺走欧美投资家在那里的交易”。

所谓期货交易，其实就是战略物资的交易，中国正在夺取主导权。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的危机感正在上升。

钢铁与造船（这里只做经济方面的考虑，至于于环境，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2004年世界钢铁产量为10.35亿吨，中国为2.7亿吨，占全球25%；根据瑞士银行（UBSAG）的统计数据，2005年将达到3.05亿吨。中国产量比美国，日本的总和还多。不过，中国优特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比重仅为8%-10%。（来源：雅虎财经）

钢铁是什么？工业的大动脉。在此之前，美日曾引以为傲。以钢铁为基础的造船工业，以前是日本，荷兰独自谋取暴利。现在加入了中国，中国即将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头羊。造船工业是中国孱弱的海军的基础。日本从经济和军事上都感受到中国步伐的临近。

围绕钢铁，又产生了铁矿石资源的争夺。比如新闻：“资源定价权，中国外战外行自乱阵脚”，“中国公司在蒙古被日本逼走，能源之争日又占上风”。（参见世界论坛）

4, 日本是如何默默地封锁中国产品的(来源：中国思维，见附贴)

三钓鱼岛屿，日本入常

其实，这两者仅仅是主题被掩盖的题外话！

钓鱼岛屿，豆子大的地方。毫无军事，经济价值。只不过都是冲着两百里海域而去的。而现阶段还无科技实力去开采深海资源，所以就搁那儿吧！愚以为，它会成为中国强大之後走向世界的借口。

日本入常。美国都没能阻止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样中国亦不能阻止日本政治的扩张。这是必然趋势。中国要做的是下下套，获取所需。比方说，中国不反对联合国改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1、中药

多年来，日本的技术性壁垒一直制约着中国中药对日出口规模的扩大。中国对日出口的不少中药都因其药物成分不属于日本承认的药品类，而只能作保健食品出售。同时，有些在中国属于保健食品的产品，却被日本认定为药品，不得不受日本关于药品进口和出售管理制度的限制。对于获得认可的药品，日本《药事法》又将其分为“一般用药品”和“医疗用药品”两类。“一般用药品”只能在普通药店出售，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但购药费用不在医疗保险承担范围内，其所占市场份额约为10%。“医疗用药品”即只能在医院出售的处方药，其购药费用在医疗保险承担范围内，市场份额高达90%。目前，中国出口至日本的中成药中没有一种被列为“医疗用药品”，因而大大影响了中国中药在日本市场的规模。

2、塑料玩具

日本规定自2003年8月1日起，日本市场上出售的玩具不得使用含邻苯二甲酸乙基己基脂（DEHP）的聚氯乙烯材料，其中以乳幼儿口部接触为主要用途的玩具不得使用含邻苯二甲酸二异壬脂（DINP）的聚氯乙烯。事实上，欧美有关实验结果并未表明这两类物质对人类有危害性，因而日方的有关禁令欠缺充分的科学依据。日方规定的“以口部接触为主要性质”的玩具范围比欧盟有关规定中“用于吮吸”的玩具范围要广得多，且“乳幼儿”所指年龄范围“6岁以下”也比欧盟所规定的“3岁以下”要大。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日本是农产品市场保护最多、农产品问题政治化倾向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经常利用不合理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阻碍或限制农产品和食品的进口。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供应国，相关产品对日本出口频频受阻。日本卫生与植物卫生检验检疫体制十分复杂。外国农产品要进入日本市场，至少要经过厚生省各地检疫所的进口检查和各地方自治体保健所的检查。

在日本检验检疫体制及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1、部分标准不合理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的农药残留标准（MRLS）比世界平均水平严格得多。

2、未充分尊重国际通行标准部分食品添加剂虽已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且被广泛应用，但因日本未将其列入获批准的食品添加物清单，含该类添加剂的产品

在对日出口时依然可能受阻。

3、植物检疫数量限制日本自2001年4月1日起，要求海关及机场防疫所以一年中进口量最多的2个月的检疫实绩为基准，将过去3年该检疫实绩的平均值定为今後每日检疫件数的上限。对超过该上限的检疫申请延迟至次日以后处理。该措施实行后，植物类产品特别是新鲜蔬菜进口受到抑制。中国蔬菜对日出口受到明显影响。

4、关于植物熏蒸的规定缺乏可预见性检疫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标准不一，一些未发现检疫害虫的货物也被要求采取熏蒸处理。另外，熏蒸处理实际上多由农水省认定的检疫团体执行，由于其处理能力有限，货主有时须等待多日，往往导致新鲜货物腐坏变质。

5、农产品身份证 2002 年日本开始实施牛肉身份认证制度。2003 年起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出售。

6、对中国偶蹄动物热加工产品生产企业的注册要求苛刻

7、《食品卫生法》修正案按新修正案规定，如果进口农产品中发现含有日本未设残留标准的农药，即使该种农药残留符合国际标准且对人体无害，也无法进入日本市场。

8、未及时澄清事实，致使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误导消费者近年来，日本媒体针对中国农产品、食品中药物残留问题，做了很多不客观或夸大的报道。中国政府已就此事与日方多次交涉，但日方始终未主动、及时澄清事实，消除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疑虑。

（六）贸易救济措施近年来，日方多次以发起保障措施调查或实施保障措施限制中国产品对日出口，其中包括毛巾保障措施调查等。日本还陆续酝酿过对鳗鱼、纺织品和自行车进行保障措施调查。

（七）出口限制措施由于日本法律规定，只要出口商“认为”（know）有关产品可能被用于开发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须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出口许可（亦称“know”管制）。该种制度使日本出口企业面临很大压力，有时出口企业明知进口方最终用户不会将产品转于军用，但苦于无法排除“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放弃出口。日本《出口贸易管理令》对捕鱼船的管制也限制了日本造船企业对我国出口金枪鱼捕捞船等。

另外，《出口贸易管理令》规定的技术提供限制领域十分广泛，且判断需审批技术的标准尚缺乏足够透明度，导致相当部分的技术出口均须接受审批。审批过程中，政府要求企业提供大量文件，甚至涉及企业秘密资料，审批时间漫长，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给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技术转让、技术合作造成了困难。

（八）服务贸易壁垒近年来，日本虽对服务业领域管理进行了一些改革，放宽了限制，服务贸易准入环境总体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建筑与工程服务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法》规定：禁止单纯劳务进入日本市场，只允许中标的外国建筑公司的管理、技术人员赴日。此类规定使外方难以运作和管理，只能转包给日本建筑商。由于日本劳动力成本昂贵，日本分包商报价很高，使得外国中标者成本核算严重恶化，最后只能被迫退标。

2、运输服务

（1）外方代表或外方表决权占 1 / 3 以上的公司，在利用船舶或者航空器从事国际货物运输时，适用不同于日本人或日本法人的许可制度。在航空运输方面，外方或外方表决权占 1 / 3 以上的公司拥有的飞行器不能在日本国内注册。

（2）现行港运体制中，外国船公司只能租用码头，无权经营码头的装卸等业务，这给外国船公司的经营造成了障碍。

（3）事前协议制度。根据日本港运协会规定，船公司在新开航线、增加停靠港和更换船名时须向该协会提出申请。该协会接到申请后与中央及地方的码头工会进行“事前协议”。这导致日本港口装卸费较高，且船公司无法自由选择服务水平较高、费用相对较低的装卸公司。

(4) 中资货运代理公司签发提单问题。日本对中方独资的货代公司适用对等原则，即如果中国政府不批准日本在华独资货代公司签发提单，则日本亦不同意中国独资公司签发提单。该做法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影响了中资公司在日开展多序联运业务。

3、金融服务日本金融检查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有时也会对外资金融企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日本对外资银行加入日本国债托管和清算系统会员资格规定了不合理的限制，中资银行反映加入此系统需要加大中资银行对日本国债的投资。日本政府在信托管理服务领域存在非审慎性措施，如规定投资信托管理服务必须由在日本注册的法人机构提供；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吸收的存款未纳入到日本存款保险的复盖范围内。



算历史旧帐，向恶邻索赔

东海一臬

近来，民间“抗日”风起云涌，受到中共压制後，依然暗潮汹涌。有友人问我对此事件的观感，以及对日本的态度。因故没有心情行文，拣有关日本的旧作一篇，以示对抗日民众活动的支持。

东海一臬2005、4、27

一、无耻的文章

早就想就放弃对日战争赔款一事写一篇东西了。这一事件如一面照妖镜，令与之有关的各方面势力和人物露了原形，令人感慨：国民党真冷（血）、共产党真狠（心）、日本政府真聪明、老蒋（介石）老周（恩来）等辈真“高尚”！同时令人羡慕日本人民真幸福，先後得到咱们蒋总统、周总理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个高喊以怨报德，因为“发动这场战争的是日本军阀，要求日本人民赔偿战争损失是不公平的。”；一个生怕“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生怕“他们将因此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而中国人民真命苦真老实，一次次被卖还一次次为卖家喝彩、为买卖双方数钱！

日前在《文摘周报》（2002、7、29）上看到一篇转载自《党史文汇》（2002年第7期，作者王先勇）的文章：《中共党史刊物披露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始末》，真为作者的无耻脸红：

国民党“放弃”了，就是“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中国政府放弃了，就成了“从大局出发，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这他妈的是什么逻辑？这是婊子逻辑，强盗逻辑，王八羔子王八蛋逻辑！国共两党为了一党私利，争相表演以德报怨的“博大襟怀”，“勒断国民的饥肠，硬充政府的虚胖”（草虾），先後把国家、人民的利益廉价而堂皇地出卖了！一丘之貉，一般又冷（血）又狠（心）、“慷慨”“高尚”（慷人民之慨，高一己之尚）！

日前在罕见论坛重睹此文，万感填膺，不吐不快！有网友敦请老臬写文，要求日本政府付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固所愿也，当仁不让。同时，老臬还想借助有关资料，趁机回过头来为大伙算一算历史旧帐呢。

二、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

按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後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极大，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中国陈列》中，展示着一幅“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统计表”。自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计有百余次，战争赔款总值多少？由于计值单位、计值尺度、计值范围的不同，说法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

不论采取何种统计，数额之巨都是惊人的，这些还不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定海、厦门、宁波、镇海掠取的官银数，以及在厦门、舟山、宁波、镇海等地抢劫後变卖财产的值银数，不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据相瑞花先生《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一文介绍：

在近代战争史上，中国偿付的赔款有：（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含《广州和约》规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英国商馆损失费62372银元；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2）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关平银1600万两，含中英《北京条约》中规定的英军军费银600万两、商亏银200万两；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法军军费银700万两、商亏及抚恤费银100万两。（3）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库平银50万两，含中日《北京专条》中规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费40万两、抚恤费10万两。（4）1876年马嘉理事件赔款关平银20万两，含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欠、抚恤费。（5）1881年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含中俄《改订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亏、抚恤费。（6）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库平银23150万两，含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辽南条约》中规定的赎辽费3000万两。（7）1901年庚子赔款，含《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的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地方赔款16886708两。（8）1906年拉萨事件赔款，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规定的250万银卢比。共计八大笔。

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巨额战争赔款，犹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

甲午战争赔款在中国财政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中国为支付日本赔款举借了庞大的债务，列强通过借贷攫取了在中国大量利权，控制了在中国部分财政主权。近代中国的财政经济自此一蹶不振。庚子赔款又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清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关于各省分派赔款数额巨大，请减免四成以纾民力电中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方今民生困穷，商业凋弊，经去年之变，各省商民元气大伤，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张之洞等并指出：“无论如何，筹加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时势，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若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行搁置不办，则民心日涣，士气日离，国势日微，外侮日甚，内乱将作，大局亦必难支。”

张之洞等揭示了当时地方各省的财政困境及其後果。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到了无财可言的地步。但是，为了能够“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各省、关仍然不得不倾力

搜刮。主要办法是加重旧税、开征新税。计有地丁、杂赋、租息、粮料、耗羨、盐课、常税、厘金、洋税、节扣、续完、粮捐、盐捐、官捐、杂捐、节省和赔款捐等项。在这些名目下，各省的筹款方法虽不尽相同，但沉重的赋税负担，都毫无例外地加在百姓身上。结果，中国的社会经济愈加停滞落后，人民的生活状况愈加贫困不堪。

近代历史上，列强发动多次侵略性的对华战争，强加给我国一份份掠夺性、强制性、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每一份条约中都规定了战争赔款。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看，一些条约是无效的。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事实上依约偿付了列强索要的赔款。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继续偿付了清政府积欠下来的剩餘赔款额。

当时，列强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想到中国人民了吗，想到他们“如果要求中国对他们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列强包括日本的赔偿，中国人民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了吗。（此章资料取自相瑞花先生《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一文）。

三、争比肚量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同时，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要求战争赔偿，原是合情合理也合国际法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后来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最后，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委曲求全，彻底放弃了战争赔偿。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久，田中角荣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日本前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60年代访问中国时，曾与毛泽东谈起过赔偿之事。在田中访华之前，佐佐木把毛主席和周总理后来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了田中，我认为对方不会要求赔偿，可是既然去，还是得作好万一对方提出赔偿要求时的准备。对此，田中回答，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我打算赔。

然而，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鉴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

担最终将落到广大日本人民的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这就是专制之国的厉害：如此重大的关系亿万人民历史苦难、惨痛记忆、生命尊严、未来发展的“国家大事”，居然由一两个人在暗室里谈笑间作出了决定，指示一下就搞定了！

于是，《中日联合声明》有了这一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

据说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说过这样一番话：“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偿，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50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

中国人民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可是，“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达成了吗。

四、关于以德报怨

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是孔子的原话，蒋介石却强奸圣人，歪用其言。1945年8月，蒋委员长发表讲话，号召中国人民“对战败的日本，要以德报怨”。于是，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怪招出手：

1、将120万罪恶累累，此时已成为中国俘虏的在华日本军人，和80万其他日本人，在短短几个月中“礼送出境”。

2、当有人提出，应将日本天皇裕仁，作为头号战犯处以绞刑时，蒋介石在各战胜国领袖中第一个提出反对，且建议美国人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意大利国王战後经公民投票被废黜，并被永远驱逐出境，只有日本的裕仁不但毫发未损，且继续任君主直至1988年才寿终正寝。裕仁死後有英国报纸说：他早就该下地狱了！

3、蒋介石反对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他说：“发动这场战争的是日本军阀，要求日本人民赔偿战争损失是不公平的”

4、反对分割占领日本。1945年美国要求中国派军队占领日本的九州岛，被蒋介石拒绝。

老蒋的慷慨大度，前无古人，倒是有来者。在以德报怨、发扬风格方面，我党堪称后来居上。战争赔款当然是放弃了，而且放弃得更主动更大义凛然。

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恶行累累，欠下了多少血债！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多么仁义礼智信啊。

我们总是强调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总是说，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主要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主张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人民区分开来。请问，如果没有广大日本人民的纵容、鼓励、支持、捧场，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能“进入”中国八年之久？

我们总是基于中日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大局考虑，处处与人为善，换来的是什么呢？是真的“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吗？不是。而是日本在教科书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上屡挑事端，是以“新历史教科书”为代表的美化侵略战争的风潮突起，日本是首相一次次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强占钓鱼岛，是说南京大屠杀属于“虚构的故事”，是为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歌功颂德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是愤怒质问“我们要一再道歉到什么时候？”，是江泽民访日时数十个右翼团体的示威高叫“停止对华贷款”，“醒醒吧，外务省”…。他们难道不属于“日本人民”？

哦，日本多年来给予中国低息贷款了。可是，请问，一、贷款等于战争赔偿吗；二、日本通过贷款赚了多少钱？三、如果日本不是资金过剩，而中国开放以来经济形势还不错，正好是投资的好去处，日本还会贷款吗？居然还多次以减少或者完全停止贷款要挟我国！

这就是以德报怨、做滥好人的结果！

五、民间索赔

曾在3个纳粹集中营待过的幸存者尤金·纽曼说过：“金钱永远是个好东西。我可以拥有它，但是，我永远不能让我的父母和祖母复生，永远不能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永远不可能让我得到过去曾经拥有的一切。”

然而，在和平年代，以什么来偿还血债呢？金钱毕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无奈的补偿和安慰，是对施暴犯罪者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是迟到的一点公正。德国二战劳工赔偿基金会在给纳粹受害者的最后一次赔偿时，德国媒体有文章说：“受害者得到了足够的伤害，而德国人却享尽风光。如今，在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至少应该还纳粹劳工一点公正”。

而当日本人享尽风光时，中国广大受害者怎么办？亡羊补牢，民间索赔！

1990年8月，九名已过古稀之年的日本老人收到了每人两万美元的受害赔偿及一封布什总统言辞恳切的致歉信。这是二战发起国之一的日本侨民向美国政府索要的12.5亿美元受害赔偿的一部分。1991年初，经过46年的努力，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及加拿大的日裔也向加拿大政府要回了3亿加元的受害赔偿。

饱受日本侵华战争迫害的中国平民，更有权利和理由向日本索赔！日本侵华战争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如日本遗弃在我国的化学武器、强征我国妇女充当侵华日军“慰安妇”及强征劳工等，日本必须予以赔偿！我们和日本之间放弃了国家之间的赔偿，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索赔的权利。

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二战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江泽民总书记在赴日访问前答日本记者问时，也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日本的侵略给我国造成3000万生命消亡和无数财富毁灭，据有关专家估算，日本对我国的战争赔偿应不少于3000亿美元，其中政府索赔1200亿，民间索赔1800亿。

1988年9月，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中国公民的第一封索赔书。1992年3月21日，童增、陈建、杨颐、陶国峰等一万名中国公民在北京发出了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日本国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谢罪和赔偿…。90年代以来，中国百姓对日本战争行为的民间索赔不断，然而，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的索赔官司有60多个，迄今除“花岗事件”索赔案达成和解外，几乎全部败诉判决。

日本政府认为，根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了战争赔偿权。日本法庭还有形形色色的理由：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庭的诉讼主体，民间无资格把政府作为被告，个人行为不应由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日本现有法律不支持赔偿，地方法院无力追究政府的赔偿责任，被告否认事实，法庭也不予认等等。拖延审理周期也是日本应对民间赔偿案的一个手段，如花岗事件起诉时有11名原告，到了庭外和解时只剩下二人。战争受害者均年事已高，战争留下的创伤之外，旷日持久的诉讼又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1951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它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与痛苦给以赔偿”。当时的客观事实是日本战後的确没有赔偿能力，《和约》又规定：有关国家可以直接和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可以给以必要的劳务赔偿。根据日本民法的有关免责规定，遭受不法行为侵害20年内不提起诉讼，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将自动丧失。我国法律界人士分析说，这些规定是不适用于战争赔偿的，与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也是相违背的。既然当时有关的国际法规已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包括对民间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已明确确定，既然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必须诚实地遵守其所缔约的条约和被确立的国际法则”，那么，这些国际法规范可以也应该构成日本国家赔偿法的内容和原则要求，而直接成为日本对中国民间受害者作出赔偿的法律依据。关于“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庭的诉讼主体”问题，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大多提起的并不是国际法上的诉讼，而是依据日本法律的涉外诉讼。因此，日本法院的观点即使能成立但也不适用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诉讼。

基于已有的判例和日本的现状，专家们普遍认为各类民间赔偿案在日起诉均前景暗淡。因此纷纷选择新的策略，在第三国起诉。

由孙靖律师担任中方法律顾问的中国二战劳工索赔团，已于去年8月23日在美国加州法院对日本三菱、三井两公司提出赔偿诉讼。孙律师介绍说：去年美国加州通过了《强迫劳工赔偿法》和《日军战争责任道歉议案》，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了《日军档案公开法案》，这些议案、法案为各国劳工起诉日本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因此，去年至今，各国劳工在美国法院起诉日本企业的案件目前已达20多起。

孙律师说，在第三国提起诉讼，对在日本本土进行的民间索赔案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花岗事件的庭外和解，以及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赔偿案在拖延了几年之後进入调查取证阶段，都和日本法院感到了压力有关。日本法院毕竟不希望越来越多的民间索赔案跑到美国去打。

据了解，孙靖代理的另一起对日索赔案——潘家戴庄村民集体诉讼案也可能选择在美国起诉，孙律师说，这亦和美国有巨大的华人社团支持有关。孙靖律师说，我们从一个

案入手，将要谋求的是全中国近40000劳工问题的整体解决。

林晓光副研究员说，在第三国起诉，即使胜诉，能否在日本执行也还是个问题。但从索赔想要达到的目的来看，我们不仅要求实际的赔偿，更注重法律过程。如果法庭判决对罪行后果进行赔偿了，那就意味着法庭首先认定了犯罪事实。

无论结果胜负如何，民间索赔可以通过诉讼让法庭见证战争的罪恶，让日本正视其犯罪的事实，有助于事实真相的揭露和正义声音的传播。

纳粹战犯的战争罪责曾经也未被充分揭露和普遍认可，但犹太人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终于使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我们对日索赔的法庭战争也将是一场持久战。应得的权益，应得的赔偿，我们已放弃得太多了，我们为了面子，为了充大头充胖子，为了一党私利，当过太多的冤大头、迂夫子、滥好人、乡愿，这最后一张牌，我们不能再放弃了。

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曾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2010年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后期限”，而德国就解决二战期间对犹太人战争赔偿问题的最后期限是2010年，美国加州就解决二战期间战争赔偿问题的最后期限也是2010年。离2010年为时无多了，索赔事宜更形紧迫。又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立法明确确定了“战争犯罪没有追诉时效限制”的原则，民间受害者的战争赔偿也不应受时效的限制。而美国加州等地方性法律法规，并不能作为整个二战期间遗留问题的最后时间期限的定论。

但是，无论如何，时不我待，事不宜迟——当年侵略战争受害者在世的已愈来愈少，少数幸存者也年事日高。老臬建议，由有关当事人和海内外各界社会知名人士、热心侠义之士成立一个“中国人民对日索赔委员会”，将各省市地方松散的索赔组织和个人团结起来，变散兵搏斗为大兵团作战，统一指挥，迅速行动，向日本政府讨还宿债，向右翼分子讨个公道，向国际社会讨个说法，给子孙后代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日本人民是人，中国人民也是人！

东海一臬2002、8、1

本文有关数字、文字资料依据：

《中国政府放弃中日战争赔偿始末》（2002、7、29《文摘周报》，作者王先勇）

《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1999年第1期《青海师大学学报》作者相瑞花）

《对日讨还劳工血债》（2002-02厦门日报）

《日教科书事件激起人民愤慨我民间索赔再掀波澜》（北京青年报2001/04/20 22:19）



中日贸易的实情-兼与老右商榷日本人的赔与赚

有风就顶

中日贸易从廖承志，高崎达之助的LP贸易开始，至今已经50年了。说句公平话，日本能够从中国得点儿利润的也就是这几年。

1973年中日建交之前，中国政府养了一批亲中人士在日本建立友好商社。这些人士是日本共产党左翼，在战争期间的反战日人，一部分在共军中服过役的红小鬼（当然是日本人）。所有的交易必须通过这些友好商社，否则一律拒之门外。

当时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也得忍气吞声的按中国的要求办事。直到90年代改革开放，这种方序逐渐改变，没有实力的友好商社逐渐的衰落下去。

谈谈老右说的用中国的廉价原料生产的产品以高出原料几十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的事。一句话，这是天方夜谭。

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原料大宗商品是什么呢？老右只知道山东的鱼虾，这只不过是提不起来的零星贸易。而且，日本水产也不是依靠中国的鱼虾。大部是北美，南美，东南亚，俄罗斯。真正的大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过去是，石油，煤炭，服装，日用品；近几年，以机械，家电产品，办公室设备，服装占了大的金额。

再看日本过去对中国的出口，从50年代到今天，钢材是大宗。其次是成套设备，机械产品，电子元件，化纤原料，化工原料。

从中能看到哪个是以中国的原料生产出产品，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中国？实际上中国资源贫瘠，很多原料要从日本进口。

再说，日本从中国到底赚到了钱没有？

请看这个价格：从5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主要以钢材出口中国（因为中国从国际市场上买不到物美价廉的钢材）。日本的当时五家高炉钢铁厂统一对中出口，与中国之间有个中国协议价。即比日本国内价格及日本出口到中国以外国家的价格每吨要低出50-100美金。从当时的新日铁的成本计算，对中国的出口不仅不赚钱，而且要搭上海运费。

直到90年代，这种赔本的买卖是在做不下去了，才开始恢复市场水涨船高的价格。

再看成套设备对中国的出口。

宝钢的建设，国内流传受骗上当。实际上，新日铁拿出了最好的设备和技术，不计成本的支援了当时的冶金部。最终的结果，新日铁反而自己从腰包里掏了100亿日元，补了亏损。

总支，日本的中小企业，过去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了利润得以糊口。大企业，大财团肯定是只赔不赚。

为什么？这么精明的日本人还会做只赔不赚的生意？

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所在，能让日本人高高兴兴的为我服务。

中日建交後，中国发现不能依靠豢养的友好人士来发展中日的经济关系，必须要依靠日本的财团的力量。

如此，以友好协会的名义，政府的名义大量，频繁的邀请日本经济界的巨头来华访问。老右想必当时还在国内，可以看到人民日报连日连版的报道，国家领导人接见日本客人的消息。

这些所谓的经济界人士，如果是到美国去访问，不可能被国务卿，总统级的人物接见。而他们到了中国可以在机场为他们铺红地毯，国家主席，党书记轮番接见。这些受宠若惊的财团头脑，无疑全成了铁杆的亲中派。

这就是，日本的经济界对中的贸易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原因。如何能成功？只有按中国的条件成交。

堤外赔了，堤内补。与中国进行贸易损失的利润，从美国，欧洲，东南亚的部分补过来，这是中日贸易的实情。



东亚问题杂谈-东亚各国对日本的历史仇恨并不一样

鲁肃

(一)

“楚王”兄谈起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仇恨态度，希望找到这仇恨的根源，他的探讨方法是从日本的行为和它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方面找到一个统一的原因，并认为，尽管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战後作了很多经济援助，但由于他们除金钱以外并未给各国带来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基础，及根本的社会进步，是各国依然对他们耿耿于怀而对西方殖民者却多少还有可原谅之处这种区别存在的原因，至少是之一。

我以为，东亚问题，与其他地区问题一样极其复杂，与其过早地试图找到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莫如先从具体一些地方入手，至少在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有关分析中，已经很有些过分空泛的倾向。我本来不想就此发表看法，无奈楚王兄“逼人太甚”，迫我表态，只好说上一说，但这个事情太过复杂，头绪甚多，只好杂陈一二，就教大家。

从表面上看，东南亚各国都在反对日本，比如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战争道歉问题，但反对日本的原因和仇恨的程度在我还不够细致的体会中是不一样的。就此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首先是韩国。韩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在诸国中最深最激烈，那是一种真正的仇恨。我所认识的韩国人无一不直接表露他们的这种感情。他们告诉我，大约一百年前，当时韩国的国王和王後被日本暗杀，十年後日本占领韩国，并宣布朝鲜半岛为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地时期长达三十多年（36？），期间，日本在那里实行了真正的殖民地政策，朝鲜人被迫改变姓氏，学习和使用日文，而且日本殖民者对待他们的态度极其蛮横傲慢。从现代人的感情看来，那是一种难以容忍的民族屈辱，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情本来是应该逐渐淡化的，但由于现代意识也同时在加强，以不断进化的现代意识去理解那段殖民时代时，屈辱和不平感也会加强，所以历经战後两代，人们仇恨日本不见丝毫减缓。二战期间，韩国男人被迫参战，伤亡惨重。妇女被迫作军妓，又是奇耻大辱。韩国人自尊心极强，近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他们已经相当于一个西欧中等强国，自然不再甘心“小国寡民”意识，急于让周围和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几个原因交织在一起，他们对日本仇恨程度最深，最急于表达，表达最激烈。这种仇恨真正出自民间，以知识分子为甚。

其次是中国。中国人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并非铁板一块，如果划分的话，大概可以有东北（前满洲）地区，日占区和未陷落区。其中东北地区比较复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的东北由于某种原因，成为独立的满洲国的话，会是什么情况？那里的人们对日本的态度会是如何？东北地区，没有正序成为日本殖民地，但日本在那里也实行

了很多类似殖民地的政策，对东北人的屈辱却又并不像对韩国人那么严重，同时日本也对满洲的建设和现代化意识有很大促进，使得即使解放後，东北也是中国工业最发达和人们受教育最完善的地区。

然而中国人从整体来说，仇恨日本人与韩国人有很大不同。我们首先认为日本是我们中华全面衰退过程中的一个趁火打劫的倭寇，甲午战争我们失败了，我们可以输给西方列强，但我们不能容忍输给“小日本”。而且，甲午战争摧毁了我们现代化的最初努力，怎么看都像是耽误了民族现代化的最好时机，这是我们恨他们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台湾的被割让，第三个原因是侵华战争。所以我们中国人仇恨日本，是因为他们使我们落後了，使我们更加衰弱了，使我们在战争中蒙受损失了，特别地，使我们这个“大国”丢面子了，我们不再是东亚老大了。

再次是台湾。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和态度很复杂，我们大陆人很难体会。台湾人对日本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他们虽然很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很欣赏日本文化特色，日常起居风格，既有被迫也有自愿地模仿日本的地方。他们的反日情绪几乎是出于对传统的中华血缘的认同感和现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来源于美国，与其说他们对日本的反对是一种感情上的仇恨，不如说是一种要求有传统密切关系的强大邻居更加尊重的情绪。

其他东南亚国家。那里的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愤怒，没有深刻的仇恨。他们的愤怒来源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他们的占领和对当地人民的粗暴和杀害。但日本的这一行为也客观上帮助他们解决了被西方殖民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对日仇恨，即使有，也十分微弱。

以上说的都是各国仇恨日本的历史原因，对日本现在很多行为愤怒和反对的现实原因，在各国之间依然并不相同，这些，下回再说吧。

(二)

上次说了东南亚，特别是东亚各国仇恨日本的历史原因不一样，仇恨程度也很不同。郑若思和朋友两位网友指出文中提到东南亚部分和史实有出入，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很有道理，我把东南亚各国概括的太粗略了。但本系列的重点，主要在东亚各国。

现在我简单说一下我对东亚各国反对日本的动机得看法，欢迎各位继续批评和指教。

韩国尽管经济实力已经算一个西欧中等偏上的强国，无奈地处三个大国之间，中国，日本，苏联都比他庞大的多，再加上在这一地区发挥重要影响的美国，韩国依然是一个“小国”。作为一个小国，韩国惧怕任何形序的战争，不敢得罪任何一方。近代历史上，四个大国都在该地区使用过武力（苏联是间接支持中国志愿军），在考虑力量对比时，大国基本上不把韩国考虑进去。所以，韩国的策略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发生牺牲朝鲜利益的大国纷争，但它所能做的却很有限。日的政府不道歉，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对韩国来说首先是感情问题，其次才是战略问题，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起不到战略制衡作用。

中国对日本的敏感，却主要是出于现实战略的考虑，即便老百姓，也是如此。日本是我们潜在最直接的敌人，日本由于同样一直警惕于中国，所以在中国看来，日本要是

强大起来的话，在事态危机的情况下，他们第一个要对付的敌人毫无疑问就中国。因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明显，连日本人自己也明白中国有这个担心，中国的战略就一定会是打压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所以即使它实际没有要首先对付中国的想法，也不得不产生那个想法。总之，中日双方几乎是想不敌对都不行，正向反馈，互相猜忌，直到死锁成敌对状态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民间和政府对对方的动向异常关注，任何蛛丝马迹都被相互猜忌的双方当作严肃的事态来看待。由于双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任何不那么小心翼翼的行为就意味着挑衅，你明知道我敏感你还不小心，可见是故意，只要是故意，小事情也是大事情。中国政府经常说日本政府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策略，一方面是为了统战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赢得国人的支持。并非实际上把感情那么当回事，真正的担心是认为日本不那么小心翼翼了，而这种行为是个严重的战略信号。

中国政府鼓励民间的仇日情绪，也出于许多考虑，一方面当然有引导民众不满情绪指向国外以保持政府的稳定的图谋。一方面也确实有“民愤”外交的策略含义。但这种外交策略也不全然是一种冒险和无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保险的留有外交馀地的做法，政府和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长白脸，而且还要让日本人也认识到这是我们的一个计谋，也就是所谓“阳谋”。当然，这种计谋有安全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民间的压力也会转成对政府的压力，日本如果成心不买账，也很容易成为对方的口实，而且红脸和白脸的颜色有不可以差别太大，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由于这中间还有台湾和美国，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处理所有这些国际关系的时候，有两个可能的思路：一个是彻底地分析多边关系，中国，日本，美国，台湾，俄国，朝鲜和韩国，制定长远的整体战略，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深谋远虑法。但由于这些关系太过复杂，特别是，所有的关系都仅仅是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下，而所有的因素都随时有可能出现变化，比如台湾就非要独立，日本就非要如常，等等，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把整体策略毁于一旦。另一种方法的只就事论事，提出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该强硬就强硬，该妥协就妥协，然後听天由命。这後一种方法可以叫做按原则办事法。问题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很难找到一种一成不变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能够测量出来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妥协。但他的好处是，减少了民间的猜测，也减少了国际间的猜测。两种办法，我以为还是後一种更保险，尽管看似不那么聪明。

我认为，政府实际是在采取一种策略加原则的战略方针，但偏向原则。它的原则是，对教科书这类事情大声嚷嚷，对参拜问题适度克制，对领土问题隐忍但不轻易妥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应有的原则，也许应该正相反？

然而不管怎们说，出于战略理由，是中国反对日本的第一原因，而并非“感情问题”。至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是不希望世界上有太多的军事强国，特别是不愿意出现一个可以轻而易举“进入”他们领土的军事强国，至于更多的，他们也只能是听之任之了。



提上来，日本是中国屁股上的疼

五骆驼

日本热切盼望国际地位能被承认，也是有点obsession。当年被美国打成半个主权国家，现在也成了习惯。其实当了常委也没什么，况且这种候补常委根本就无法与五大常委比肩。人家早就放出话来，新任常委没有否决权。

不过毕竟面子大好，日本人想这个政治大国都想疯了。中国真要敲竹杠，还真能赚上一笔。

日本外交基本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办，官僚气息很浓，技术性强，缺乏魄力，也不允许魄力存在。估计日本入常后也会不改初衷，以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或许划定范围给日本自理，中日在东亚和世界舞台有的好斗的了。

一山不容二虎，日本和中国是地缘政治的天敌，竞争是必然的和常态的。能源，人才，资金，市场都是竞争的战场。一点点展开，一点点发展，类似于英法的百年竞争。中日又有世仇，关系想好都难。

我看不如承认现实，干脆挑明竞争关系，别遮遮掩掩谈什么友好。就是对手，就像小布什一样直说。我现在越来越佩服小布什的理想主义，单边政策，敢想敢做，不拖泥带水，真心捍卫美国利益！看看疯长的油价，瞅瞅中印为了买石油而一掷千金，不得不佩服小布的狠劲和眼光。

日本相比美国，离祸害还差得远呢。给自己松绑还来不及，近期也只能巴结个常理差事。中共在台海明攻实守，受日美牵制的时间还长，也不希望真把日本得罪狠了。

至于经贸关系，中日互相依赖处很多，竞争处也多，无法用同样政策一并处理，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高科技领域，投资领域中国相求多些，家电和制造业，中日竞争多些。

总之，把两国关系引入有规则的国际关系游戏是正确的态度，否则动不动就互相威胁，性命相搏，只能受害于愚蠢。任何东西都是交易，申常如此，参拜如此，修书如此，钓鱼亦如此。没有什么凛然不可犯的原则，没有什么底线，胜亦欣然，败亦可喜，中日大度游戏，此消彼长，斗志斗力，方是处长之道。

中国民间反日也可当作筹码，只要倡导理性反日，讲出道理，明白中国利益和日本利益必然冲突的地方，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老百姓明白了意气用事的坏处，也就多少能理解政府的苦衷。从这个角度讲，我主张对日对话，缓和，人为降温，政治不玩导向还叫政治吗？

日本是中国屁股上的疖子，挤要感染，切又怕痛，只能吃药自己消炎吧。



为什么要了解日本

信天翁

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日本？这理由多得简直说不清。首先，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的邻国，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玉皇大帝他老人家大概不会派夸娥家的少爷下凡，象当年搬走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把日本搬到加勒比海去。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强邻挤在一起一般没什么好事。战国时代的老祖宗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美国在历史上基本没有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它欺压隔壁的墨西哥却无微不至。中国的不幸，在于它跟两大强国——俄罗斯和日本紧紧挤在一起。以人口比例来算，中日都是资源小国。如今中国大陆上的石油已经挖得几乎山穷水尽，以我们那种“浪费王国”的消耗速率，六十年代被王铁人扔到太平洋里的“贫油国”的帽子，咱们迟早又得捡回来乖乖戴上。陆上的油挖完了，只有到海上去，但要上那儿就得迎头撞上老倭那个巡海夜叉。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争端只是大戏开场前的一声清笛。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日本是感情上势不两立的敌国。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楼下有人问是不是留日的都仇日，只有一位先生敢出来否定，而另一位先生则肯定了“留过日的多仇日”这种说法。当然，这个问题需要民意测验的科学手段才能较准确地回答。但我相信，即使那些不仇日或亲日的留日学人，大多数恐怕也不敢出来公开承认他们的情绪取向。相比之下，要一个具有亲美倾向的留美学人公开承认他的心事就绝对不会有类似的困难。说美国好，顶多只会换来“歌颂美国幸福生活”的冷言冷语，而要说日本人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就得横下一条心，准备象林思云先生那样豁出去做千夫所指、万众唾弃的“汉奸”和“日奴”。两者头上的“降唾沫量”是“细雨湿衣看不见”和“昨夜雨狂风骤”的差别。

客观地说（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仇日情绪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最大“客观度”），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远因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下场不同，首先是因为纳粹战败时冷战尚未开锣，美苏蜜月尚未破裂，再加上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强大势力，使得纳粹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战犯们统统授首。巴顿将军只是因为主张利用纳粹军队去打苏联，就闹到被解职的地步。而日本投降时冷战已经开始，苏联在东北、朝鲜趁火打劫，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满州和北韩，神州陆沉正要开始。所有这一切，加上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急剧扩张，使得日本成了反苏反共的第一线。取战略守势（所谓“围堵”）的老美给老毛子吓坏了，自然要姑息包庇日本战犯。他们不仅使大批战犯逃脱了审判，而且使军国主义从未受到彻底清算。战犯岸信介居然能在五十年代出任首相，而且军国主义馀孽竟可长期盘踞政坛，形成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种情况在西德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以上事实，老美如今也供认不讳。老芦看过的一部电视文献片，就是详细披露他们当年是怎样把日本的细菌战机密捂下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国共争端，双方竞相讨好日本，把当年的敌人当作“统战对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几十年来的头号敌人都是同胞，当年的国仇自然顾不上去

清算。我们不仅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几十年如一日、追遍天涯海角去捉拿凶手归案，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中共出于对“大日本皇军”（毛泽东原话）客观上帮助他们上台的感激之心，甚至捏造出“中日人民传统友谊”的神话，不是帮着日本去谴责原爆的“罪行”，就是鼓励日本去向苏联争“北方领土”。为了一党私利反美，竟然堕落到不惜谴责当年最主要的盟国、中国的救命恩人的“战争罪行”的地步，这种事也只有中共这种毫无原则、只讲“策略”（权术和诡计的代名词）的政党才做得出来。于是，数千万死难者的血迹，就这样在政治家的伟大战略部署里轻轻抹去，成了再也难以捕捉追觅的幻像蜃影。

然而那史无前例的深重的民族创伤却不是谎言的薄薄油膏可以抚平的。等到中共稍稍放松舆论控制，当年被强压下的血海深仇便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随着全民从三十年的催眠术中醒过来，我们就免不得要捡回昨天的仇恨。为了维系统治，中共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万能法宝，原意是拿来推搪专门在中国“人权”上做文章的老美，不是针对在人权问题上从来装作天聋地哑的老倭。可惜，民族主义的核心其实是仇恨，而仇恨一经煽起就再也难以控制它的流向了。

为此火上加油的是日本政治家们惊人的短视和日本人民那无以伦比的刚愎。上次敬爱的江主席怀着满腔满腹的憋心脏的单相思，布帆东去访苍鹰。刚刚对韩国道了歉的日本却如刁德一一般，有本事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是不给江总他想要的东西，气得他以大国元首之尊，忍不住要效委屈的小媳妇，私下对记者嘟嘟囔囔地发泄一番仇日情怀。虽则唐外长过后赶快声明老江的访问是伟大的成功，然而恐怕连月里嫦娥都听到了那一声耳光是何等的清脆嘹亮。江总扔下了一个没签字的公报不说，还竟然糊涂到让唐外长去宣布代民间免去索赔。挨了耳光还送礼，这种受虐狂的贱德性又如何让对方看得上？

经过这番史上罕见的折冲樽俎，老芦此生大概永远也没指望看到老倭道歉了。而老倭越不道歉，我们就越要靠“外交部声明”、报刊社论去不疼不痒地骚扰对方，以此来应付海内外华人沸腾的怨恨。然而越是从事这种恼人而不吓人的“麻雀战”，我们就越是惹恼日本的普通民众而让政客们看穿贵州驴儿的虚弱，强项而有恃无恐的老倭也就越不道歉。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中日迟早要从感情上的敌国变成事实上的敌国，不管双方的政治家们的主观意图怎样。

因此，中日之间的怨仇就象一个脓包，当年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而用麻醉药膏复盖起来。过后双方政府又因为惊人的鼠目寸光，采取“无为无不为”的“不治之治”的医疗方针，使它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而长得越来越大，最终要变成要命的败血症。如果中国人有点以色列人的骨气并稍微知道点人命的价值，如果日本人有三分德国人的眼光、心胸和基督徒的忏悔情怀，中日之间不是不可能象法德、以德那样算清宿怨而达成民族和解的。历史和民族特性使亚洲两个伟大的黄种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和解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使中日怨仇难以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序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开放前，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国际上搞“亲不亲，阶级分”，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放大到国际舞台上，以为凡教友即亲兄弟，而亲兄弟之间只有绵绵无尽的恩爱。这种“意识形态外交”违背了起码的市井常识——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浅显道理，我们的政治家们却不知道。这也难怪，为地缘政治决定的民族利益冲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的。

否认了民族矛盾，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只会使摩擦逐渐累积而变成难以消弥的剧烈冲突。由于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种非阶级冲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对方革出教门，以宣称对方是叛徒来维护学说的完整，而这么一来就封死了妥协折冲的余地——否则我们自己也要变成同流合污的叛徒了。就是为此，当年我们那些“胞波”、“兄弟”、“同志加兄弟”等等，后来没有一个不变成“反动派”（印度、缅甸、印尼等）“霸权主义”（越南）、“修正主义”（苏联、东欧诸国、古巴等）的。一个国家曾和世上这么多国家闹翻，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外交史上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对蔑视它的人们的惩罚而已。

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序还发明了一种“人民至上”论。根据这个理论，人民是决不会错的。两个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然而据说人民却总是友好的。如果是侵略战争，则侵略国家的人民一定什么责任都没有，该负责的只是统治阶级中那一小撮战争贩子，是他们违背民意悍然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两国人民头上。所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谈不上谁欠谁的。

用这种理论来考量，伟大领袖当年拒绝日本社会党和田中首相的非正序道歉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既然日本人民只是受害者，有罪的只是当初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现在的日本又不是那些人当家，还道什么歉呢？同理，既然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还要他们赔什么钱呢？

这种理论之荒谬，似乎用不着多说了。七十年代许多国家跟中国建交，每次“两报一刊”专发的社论中都要盛赞该国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歌颂两国人民之间那历史悠久的友谊。有的国家老芦连听都没听说过，想来连当年的郑和老公公做梦也不曾梦见过，然而据说我们却早就和该国的人民如胶似漆了，这真是从何说起！老芦出国有年，也曾去了几个国家，至今没有考证出这“两国人民的友谊”究竟是天地间的什么怪兽。倒是“两国人民间的仇恨”还不费劳思：眼下就摆着十二亿中国人民对“倭猪”们的仇恨。比起那虚无飘渺、由没几个人知道的个别“崇唐媚外”的留学生晁衡和倔如骡子的传教士鉴真代表的“友谊”来，这仇恨倒真是伸手即触、炙手可热。

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愣是建筑在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当年伟大领袖有句话，道是：“寄大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希望”，我们“向前看”，慨然免去了战争赔款，指望着这友谊是双向的，人家日后会用同等的慷慨来回报我们。可惜你丧失常识，人家没有丧失常识，指望着日本人民无师自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中国人民当成亲骨肉，这希望未免也大得豁了边。据说田中当年身上的金票是大大的有，专门带着来买单的。既然你不要，得，那是你的事，以后咱们这事就两清了。而且你又拒绝非正序道歉，又不要金票，看来咱皇军当年还真没作过什么恶，不然我说怎么这么容易就开○了呢！

“九州铸铁终成错”，历史上大概难以找到恶果如此多重（chong）、影响如此深远的类似的外交灾难。如果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没能象清算纳粹那样清算日本人的战争罪行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的错误的实在是不可原谅。倘若我们笑纳了田中乖乖捧上的金票，即使我们没能象犹太人那样惩罚了凶手，至少当年的损失得到了部份补偿，创巨痛深的民族心理也就不至于象后来那么失衡。而且，“施恩望报”是人类的天性，哪怕否认“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摆脱不了这个毛病，何况还有“友谊”那个“大的希望”值在那儿摆着。以后向日本人要贷款、买彩电时，我们就免不得时时记起当年己方的慷慨，指望人家就算不暗贴我们、给点优惠，至少不要如此针锋相对、锱铢必

争。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感恩图报，我们就免不得气不打一处来。可惜，对方却绝对不能理解我们的心事。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的怪物：当初是你不要赔款，又不是我赖帐。既然你不要，这事到此了结，跟以后的银钱来往有什么相干？明给不要，却要暗占便宜，这算是哪一子的兵法？龟孙子的兵法！动不动就拿勾○了的旧债来讹人，是不是要咱们一辈子都得见人矮三分？这样，当年的慷慨反而成了促成民族误解的触媒，使两国关系蒙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说来可悲，类似的错误，咱们是犯了又犯。建国之初，印度是少数承认中国的非共国家之一。那时“中印友好”、“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声响彻云天。在一片“友谊”声中，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越界向北推进，进入他们历史上从未占领过的传统边界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五十年代后期抵达麦氏线。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友谊”默不作声，甚至在印军占领西藏宗教圣地达旺、驱逐当地居民和僧侣时，咱们也全当不知道，把整个东段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暗贴给了印度兄弟。可惜这却未能买静求安。在印度人看来，中国默不作声就是情虚理怯，默认了麦氏线的合法，所以在西段当然也要“收复失地”。不幸的是西段内恰有新藏公路穿过，那是控制西藏的战略公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人民的好总理因此不得不和印度兄弟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我们的底线很简单：第一，东段就送给你们了，但西段有战略公路，实难割爱，还请高抬贵手。用总理的话来说：“我们在东段让步，你们在西段让步，好不好？”第二，“麦克马洪线”太难听，是英国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的污辱，所以，我们可以在东段按麦线划界，但最好将该线改称为“实际控制线”。

本来，印度白得了个从未领有过的东段，已经是捡了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然而咱们的友谊该兄弟就是不能理解——人家不懂咱们的“孙子兵法”：你既然同意在东段按麦线划界，说明你承认该线合法。同样的原则当然应该应用于西段。只因为你还在那儿非法修建了战略公路，就要咱们放弃合法领土，天下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事？至于改名的要求就更是无理。麦线是咱们的法理依据。改成不明不白的“实际控制线”，到底谁算侵略？难道世上可以不讲法律、条约，凭实力去“实际控制”就成？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兄弟成了反动派，革命派和反动派大打出手，把反动派打得鼠窜回平原。然而失地尽复之后，咱们又按“孙子兵法”撤回“实际控制线”来，听任印军卷土重来，在那儿移民设邦，将其化为永久领土。赢了后撤，当时确实是震惊世界。不过人家倒没有为咱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得五体投地，却一致认定中国是侵略者——世上没有谁能弄明白咱们那实在难懂的“孙子兵法”，却只会以小人之心度“孙子”之腹：你不是侵略者，怎么会心虚地逃回去？更严重的是，此仗被印度全国视为国耻，该反动派从此放弃“不结盟”国策，穷兵黩武（印度原来基本没什么军备）、卧薪尝胆地要“收复失地”尽雪国耻。老芦乃至小芦甚至小小芦的有生之年，恐怕都看不出中印如何解开边界问题这个死结。如果当初“亲兄弟，明算账”，御兄弟于国门之外，何来后来这么多孽障？

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外交有了长足的进步，“孙子兵法”是丢了许多了。然而党文化却已经成了一种民族思维定势，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友谊”的神话至今牢不可破，而对某国“友谊”的单相思的破灭，使我们在打量世界时始而含情脉脉，继而困惑迷惘，再而大失所望，终而七窍生烟。我们不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常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我们指望人家无缘无故地爱我们，则这指望难免最终要化作无缘无故的恨。国人从七、八十年代对老美的一厢情热，变成了满腔憎恶（似乎还没有到恨的程

度，不过也快了），这种幼稚的民族心理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如今我们似乎又爱上了老毛子，进入了新一轮“因爱生恨周期”的初级阶段。

当然，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情绪里也确实有无缘无故的非理性成份在内。就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放大了有道理的怨恨，并妨碍了仇恨的化解。我们不知道或是不肯承认：不仅日本人民（不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整个民族）过去对不起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难以饶恕、不可忘怀的罪行，而且作为两个挤在一起的邻国，我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将是千丝万缕的。因此，两国人民之间决不会有什么轻易的友谊。处理不好，我们就会变成再次性命相扑的仇敌。解决这个问题正确态度，应该是把脓包割开，使日本人民当年的战争罪行尽可能得到清算，使中国人民的心态失衡尽可能得到矫正。而且，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我们一定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复杂性，一定要基于对两国的民族利益的实际考量，一定要把旧债和新交易分开，决不可随便放弃民族利益，也不要指望人家会象咱们一样随便放弃民族利益。

很明显，要作到这一点，最起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人家的国情民俗、民族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序有点了解。要是我们当年对“兄弟”们的内心世界稍有所知，也就决不会干出那些花了无数血汗钱，作了无数次冤大头，还买了一大群仇人的蠢事。

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是在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苦苦折腾了一个半世纪，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象西方一样富强，寻回往昔的光荣。这个如此难圆的中国梦被总结为“现代化”。可笑的是，一般中国人都认同这个口号，却又拒不承认这个口号默认的两个现实：第一，迄今中国仍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第二，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因为“现代”实际上是“西方”的同义语。因此，“现代化”实际上和“与国际（=西方）接轨”一样，都是遮遮掩掩的“西化”口号。这种遮掩固然满足了中国人那举世无双的虚荣心，然而模糊了一个为十几亿人民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光从我们故意模糊自己的目标、以及全体人民可以去奋力追求一个暧昧不明的目标这两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本民族的智力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当然，反驳者们会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四个现代化，亦即只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有限方面实行西化。然而，姑不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被祖宗早就试过而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就算是所谓“中学”，如今又在哪里呢？当今中国的社会、国家、政党的组织模序，无一不是西化的结果，只是这些东西于今已经被西方人抛弃而已。中国人在社会科学上的发明能力，早已萎缩了两千年。从《天演论》到《资本论》，那些曾在中国掀起狂涛的政治学说，有哪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创见？我们除了热热人家的冷饭，剽窃点残汤剩水，民族的大脑究竟有哪个瞬间闪过一星天才的灵感，想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在政治上“回归传统”，我能想得出去处就是孟老夫子的“井田制”和老子那“小国寡民”的“桃花源”。难道我们还要钻进洞里冬眠，象北韩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世上竟会有这么多的生灵膜拜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端的是对上帝赐给人类的大脑的一种侮辱！

倒是孙中山和毛泽东反而还比徒子徒孙们直率些。孙说，国民革命必须“以俄为师”，毛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都坦承中国人想不出自己的路来，得靠人家指点。不幸的是这条路一走几十年，杀人盈野，伏尸亿万，其结果是使中国堕入更深的黑暗。世上从没有哪个民族象我们这样，为了“富国强兵”这个有限得可怜的目的

标，吃了这么多的苦头，经历了如许深重的苦难。然而在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後，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我们仍然在泥淖中旁徨，至今寻不见一点光亮，看不到一丝希望，找不出一条踏实的路途，甚至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有的只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或跳着脚操鬼子的娘，或按着“汉奸”的头往地下撞，或身居海外华屋怂恿草民革命，或隔着大洋主张对同胞甩原子弹……呜呼！吾族何幸，蒙上天恩赐这口百年浓痰，吐不出，咽不下，塞住了心窍，呛晕了神智，憋出了那无穷无尽长篇连载的羊角疯之发癫发昏章！

我们失败的凄惨，反衬出日本人的辉煌。人家从来就没有遇上咱们的“鬼打墙”。我们那解不开、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在人家那儿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当年咱们可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老林虎门烟的同时，老美的炮舰也去东瀛叩关。我们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上按杨白劳的手印时，人家也得忍受“领事裁判权”的羞辱。可我们挨了痛打，只会缩回窝（别字）居去，刨出祖先的封诰来自慰，人家却开关延敌，不仅连未来的首相都去“洋插队”，而且有勇气扔掉“民族尊严”，喊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明治维新不过十来年（？），人家就打败了人口、资源、GDP、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甲午战争後不过十年，人家就打败庞然大物俄罗斯，开创了黄人战胜白人的首次记录，愣是挤进了列强俱乐部，成了其中唯一的有色人种成员。二次世界大战，人家南下马来半岛，骑自行车穿过据说是不可逾越的丛林，乘舢舨在军舰无法靠岸的海滩登陆，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号称不可突破的英军防线後方，迫降十几万英军，造成了丘吉尔所说的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靠着三个最强大的白人国家和世上最大的黄人国家的合力，加上原子弹那杀伤力空前的秘密武器，国际社会才勉强把这个魔鬼收入净瓶。然而三十年後，人家又象火中凤凰，从灰烬中崛起，换一种方序征服世界，让满世界跑着丰田车，家家看着索尼大彩电！比起咱们来，人家有什么呢？两亿人挤在那个蕞尔小岛上，有的只是地震、海啸、火山和硫磺温泉。以如此微薄的家底，在如此短暂的时段内，从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後国家一步登天变成现代超级强国，这么急剧的社会转型，其间竟未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阵痛和脱节，如此平和，如此顺利，既没有咱们的大砍大斫，血肉横飞，又没有权贵中饱私囊，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奇迹，不要说是在前现代国家见所未见，就是全球也并无二例！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中日两民族之间，到底是什么性格上的差别，决定了咱们下场如此迥异？就算是咱们除了刺探隔壁的丑闻之外对外界毫无好奇心，为了过去吃过的那无数苦头，为了咱们这个不成器的民族的未来，恐怕也得琢磨琢磨人家成功的诀窍吧？

可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为自己谋划出路，在原谅自己找借口时，咱们却是天资非凡。小小芦当年学历史，问老师为什么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老师说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再问为什么行不通，答曰帝国主义不让。小小芦深觉有理，虽则仍不明白帝国主义为何要偏爱小日本。等到小小芦变成小芦，读史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帝国主义爱的是光绪，讨厌的是老佛爷，这一下再怎么也想不明白了：光绪爷不是改良派的领袖么？帝国主义不让咱们改良，为何又不准老佛爷废了老光，甚至希望他当家，以致激起拳乱？

可笑的是，这套连青少年都骗不了的饰词，如今却还在咱们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犹记当初网上枯木朽株齐努力，痛剿日奴汉奸林思云，有位壮士竟以日本没有资源、引不动帝国主义的胃口为理由，来科学地解释日本改良成功的秘密。如此看来，咱们要让目下的改革成功，还得使出“焦土政策”的绝后计，先将咱们的“地大物博”自行毁去，才能使本民族“置之死地而後生”。当年献身改革事业的先贤们竟然见不及此，可

惜啊可惜！

很在国内流行过一阵子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新儒学主义”，据说日本鬼子的发迹，还是沾了孔老二的光。可惜在老芦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和当年咱们说西洋鬼子的“千里镜”、“自行船”是“得见中国古书”偷去的发明没有什么区别。既然老孔有这个能耐，“同光中兴”时他老人家何不大显神威振兴中华？却让日本的盗版孔来“劣币淘汰良币”！

还有一种心态是对小日本的鄙视。据说日本人只会抄袭，从无创新能力。当初学咱们，现在学西洋，你既然会学，我又何尝不会学？“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哪有不学老师学徒弟的道理？

比起“回归传统”论来，此论是极大的进步，可惜论者没有看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咱们只有造反作乱的能力，没有学习改良的能力。要想学西方，咱们先得去学这个学习能力，而要论学习与应用，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咱们看不上的小日本。

把西洋文明成套地连根搬过来移植在自己的土壤上，不仅让移植物在本土上顺利成活并茁壮成长，而且与传统文明中的精粹相得益彰，既不使强龙压死地头蛇，又不让地头蛇吓跑强龙，更不让“龙蛇斗”引起社会动荡，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小日本正是制造这种奇迹的专业户。当年他们学中国引入文字就是个绝佳例子，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日语是多音节语言。按理说，与汉语配套的一字一声的中文和日语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毫无应用的余地。考虑到本地语言的顽固性和引入外来的崭新的概念、语汇和发音的艰难，日本人面临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他们就是有本事把中文移植过去加以改造，一直使用到今天，还创作出大量美不胜收的非（人非）句与和歌。等到后来“脱亚入欧”，人家又能利用已有的汉字造出大量反映西方复杂生活概念的词汇，反而回馈到中国去形成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基础。相比之下，想当初咱们只不过是翻译篇《波罗密多心经》，就无奈到只能将整句的梵文音译过来，弄出些谁也不懂的“波罗僧揭谛”来。虽然日本人发明的“以字造词”开了现代模糊文化的滥觞，然而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真是如同能化作绕指柔的百炼精钢！

日本人的机灵、弹性和应变能力，不仅和咱们那杖策蹒跚的天朝上国的僵硬、死板、麻木和惰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就连西洋鬼子也赞不绝口。二战后，日本在瓦砾场中抱住用原子弹炸他们的老美的粗腿，甚至抢在西欧之前从战难中迅速恢复。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无限抬高油价造成能源危机，日本人洞烛机先，迅速设计和推出省油轿车，使反应迟缓的老美的福特车在国际市场上溃不成军。八十年代老美逼得日元升值，老倭们竟然想出“出口老人”这种怪招，让退休老人挟着坚挺的日元去国外养老！

最主要的是，日本在过去的千百年内一直和中国共享类似的东方文化背景，是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西化的最好的学习榜样。研究日本在西化中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经过，研究他们如何用和平的手段去化解急剧繁荣的并发症，诸如权钱转化、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等等问题，是我们避开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革命的现代化陷阱的必备的一课。

总而言之，要西化中国，我们就得学习日本人的学习能力、调整自己适应外界的应变能力、以及化解社会危机、预防处理改革本身造成弊病的改良能力。一句话：中国要西化，必须以日为师。走日本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注】本文所述中印冲突始末取自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一书。该书在大陆文禁最严的七十年代初在大陆出版，作者（英国人）并被邀请至大陆访问，说明官方认可该书陈述的事实。



中日抗争的战略立场是一样的

邈邈道士

最近二星期中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日示威，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被视为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冷峻局面。因此牵引出来的种种政论文章，众说纷纭，尽管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与分析，可惜只有屈指可数的论者掌握到中日抗争的国际关系要害是完全一样的。

某些所谓“民主自由份子”或“职业民运活动家”（=“运动员”）以及反共“义士”们，当然膝盖反射性地站在诋毁中共政权的立场去借题发挥；某些“日本在住”的华裔精英则根据日常生活中和日本民众接触的印象，尽量利用“文化”或“民族性”因素去替日本政府辩护；至于一般愤青们言不及义的叫嚷，自然更是不在话下的了。

其实，国际关系的基本重点极为简单：维护本国利益而已。换言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某些点点滴滴的、民间偶发的“人道支援”（例如最近的“海啸天灾”）外，凡是有政府插手的所谓“外援”，毫无例外的全是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去考虑的，绝对没有“道义”可言。这次的风波，基本上是中日两国潜存利益冲突的表面化而已。

〔必须及时指出，中国现代历史上确曾有过盲从“意识形态”信仰而采取“打肿面子充胖”的“道义”外援往例，但那是举世无双的幼稚病态（也有一部分是突破国际围堵困局之下的“自存”考虑），应该是惨痛的“学费”，不能算是常规。〕

那么，任何国家面临外交纠纷时候，如何界定“本国利益”的战略范畴，如何策划现实运作中的“战术”步骤呢？

关于前者，本坛的信天翁已经在他的《爱国战略》（#599576）一文中有相当详尽的叙述；也就是他谈论到的“爱国战略”中的“力争全民的根本利益”那句话。万变不离宗，只要抓住这一纲领，其他的都不难明了。为什么那么简单的立场，许多人都看不到呢？窃以为那是“一叶遮林”的现象，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己或一党一派“利益”的叶子，没有看到“全民利益”的林子。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

毋庸置疑，如果肯定上述的“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日本必然也会“力争”日本的“全民利益”。那么中日之间的纠纷，显然必须从这个“利益冲突”的症结去分析。下列的每一问题，包括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育部批准篡改二战历史、日本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日美安防协议添加周边条文、以及日本入常等等，都是和钓鱼台主属问题、争议海域探测能源问题、国际油管路线问题等，都是与中日两国的“国家全民利益”无法分割的，也都是经济、国防以及地缘政治地位的大问题，和日本人是否反省二战罪行或是否悔过道歉的“道义”委实拉不上太大的关系。

尽管如此，了解这些“冲突点”所隐含的长远利益，显然是知己知彼所必要的功课；值得谨慎留意；但却没有必要把它们视为“合理”的退让前提。换句话说，既然大

家争的都是利益，那么如何在“利益”的平衡交易上，取得最符合“双赢”的妥协，这就是战术运用上的智慧和技巧问题，也是信天翁“数落”的“外交灾难”的具体内容，却也正是其他网友表示见仁见智声音的话题。这方面的讨论，应该让那些更有经验的专家们去深入探讨。

应该指出，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考虑都得接受客观现实的制约，而且还有利益本身的轻重、久暂、以及缓急先後等等衡量上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国际“大气候”，也就是大国之间的远近纵横关系以及彼此所占有的战略份量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在上述的众多“冲突点”中，中国必须确定台湾问题的重心位置，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向全世界发出毫无妥协余地的坚决信号，严厉警告任何第三者插手其间。因为那是中国久远利益中的最主要战略目的，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容退缩的。

最後不妨补充几句，执政者的作为和民间的作为是不同层次、不同政治效应的行为，是遵照不同的条件和“游戏规则”而出现的。可是，老百姓在战争期间所遭遇到的灾难毕竟是最直接、最切身、最具体、而且是最难释怀的；因此，民间的反应断断不能和独行其是的蒋、毛等最高领袖的“以德报怨”同日而语。因此，老道绝对不同意那些将目前的民间示威比拟为“义和团”（或“拳匪”）的诬蔑。须知连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也都有假借民意去推动执政方略的“榜样”；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市民的抗日运动，肯定在国际舆论上要发挥出无法预料的启蒙效应的。如果这些自动自发的“民意”能够帮助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助威”而获取更大“利益”的话，没有任何有中国心的人能够反对或胡乱给予谴责的。（请看本坛难得一见的日本网友的发言，谁能责怪他们为本国或本族的“利益”互相呼应呢？）网上的书生之见，未必完全可靠。当政者无疑能掌握更多、更全面的资讯，他们肯拿民间意见当参考已经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了，一味谩骂恐怕未必是明智的。



替亲日右派说几句公道话

根源

这段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反日情绪的急剧升温，网上不同立场的阵营分歧日益表面化，尤其在所谓的“右派阵营”内部，在对日的立场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局面。

诚然，只要能够做到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不把己方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将分歧摆上台面去探讨和争论，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乃至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有所提高，至少也总比台上一团和气，台下互想使绊要强得多。

但是，伴随着在“反日”态度上对立的白热化，一种大家不愿看到的风气却在“右派阵营”中蔓延开来，如亲日的说反日的是“愤青”，反日的说亲日的是“伪民主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想，这种风气是十分不可取的，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令亲者痛而仇者快。

其实，只要我们把各自的火气压一压，站到更高的位置上去看一看，我们就能够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右派阵营”之中，对社会各领域其它绝大部分问题的看法，都不存在着太多实质性的、不可弥合之分歧。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认知上如此，对目前社会现状的研判上如此，对本国及前苏联、东欧几十年来的历史的认识上如此，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上亦如此。

在对日立场上的泾渭分明、尖锐对立，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特例”。同时，也并不见得会单纯由于在这个“特例”上的尖锐对立，使得原本有着广泛共识的上述诸多方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或改变。

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出这种深刻的分歧，探究一下背後的深层次原因，更高屋建瓴地理解对方的立场，承认对方立场的某种合理性，我想这样才会有所提升，这个“右派阵营”也才能以身作则地向整个社会展现出其对不同意见特有的包容。

本人从不隐讳自己是一个坚决彻底反日的右派，在这几年来的数次反日浪潮爆发期间，本人都积极给予支持和声援（这回若不是前段时间本人要绞尽脑汁码出一份全国性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总结材料，无暇顾及其他的话，恐怕早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中去了）。但是尽管本人铁杆反日，自问也从未对任何表达对己反对意见甚至恶言相向的右派朋友有过任何不礼貌之言行，或扣过任何大帽子。

反而，在积极反日的同时，本人倒是以冷静平和的心态，对双方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剖析，包括各自的观点、立场，在这些观点、立场的背後隐藏着的“潜台词”、“潜话语”，及其形成的背景、孕育的历程，以及其具体观点的弱点、“七寸”才哪里，总体立场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等等等等。将来有空闲、有精力的时候，我会考虑把这些内容详尽地整理出来，系统地加以分析，现在只打算粗略地提一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孕育过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很早就意识到，右派阵营在对日态度上的这种分野，很大程度是和时代紧密相关的；他们不同的对日取态，可以追溯到其各自本身的成长历程当中。

具体而言，老一辈的右派（及其思想的传薪人，下同）对日本没什么好感，视之为敌的占多数；新一辈的右派对日选择较友善的态度则居多。老一辈的右派虽也亲美，但普遍认定俄（苏）、日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新一辈的右派则既亲美也亲日，对日本的诸多方面赞赏有加。为此，我很早就以对日取态作为分水岭，提出了“传统右派”和“新派右派”之概念——一如武侠小说分了传统和新派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野呢？我个人以为，其中的时代烙印是非常鲜明的。老一辈的右派，生长在上世纪的上半叶，耳闻目睹过侵华日军大量灭绝人性的残酷暴行，即使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後，有关方面长期有意识地对日本侵华的暴行进行掩饰，但对日本仇恨的种子，却已经是难以从他们的心灵中磨灭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极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日本社会急剧向右转，使得他们又再次勾起对日仇恨之怒火。

而新一辈的右派们则多生长在上世纪的下半叶，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在那个时候，日本极右翼极力仍处于调整和蛰伏期，当时的日本国民对那场不义之战多少仍存有一些负疚之心，而且当时中国仍闭关锁国，到日本谋生的国人较少，低素质的国人在日本沦为害群之马的现象也远不及後来普遍，故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抱有好感的还是较多；另一方面，由于进入上世纪下半叶之後，中国这边长期为日军当年令人发指的暴行打掩护，令国人对侵华日军当年令人发指的罪行认识普遍较为笼统，而打开国门後发现东边这个邻居经济上这么富有，产品如此美观、精致、耐用，社会如此有序，国民素质也非常高，因此对日本整体而言比较崇敬。在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渡过了一个比较和谐的蜜月期。

当时两国在文化交流上也非常活跃和卓有成效，在那个正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民众普遍扬弃陈谷子烂芝麻的年代，日本的一些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成了我国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如《机器猫》等优秀的日本漫画，《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姿三四郎》等优秀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对当时的青少年儿童产生过莫大的影响，他们提起来至今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故此，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右派，对日本那种几乎就是与生俱来的好感，也是浑然天成，难以磨灭的。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中後期，随着言论、出版的尺度的日渐宽松，日本当年侵华时种种令人发指的历史，又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感到震惊之余，更多的却是出离愤怒。进入九十年代之後，由于日本参与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令中日官方蜜月期草草结束。这段时期日本极右翼势力急速抬头和扩张，尤其是九三至九四年的日本政坛大地震过了之後，日本的领导层一届比一届偏向极右，做出的不智之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令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的关系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再加上有些到日本淘金的国人，能力低下，素质奇差，长期不能适应日本社会，更难以融入到日本社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在日本作奸犯科，令赴日华人群体的犯罪率远高于日本本地国民及其他外国来日人员，给日本民众留下了一个极其恶劣印象，也向那些以反华为己任的日本极右翼势力提供了攻击中国人的免费弹药。

在这种大环境的逆转之下，老一辈的右派和新一辈的右派在对日态度上存在南辕北辙般的相反取向，那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我仍然认为，即使在对日本的态度和价值观等存在截然相反的取向，且分歧一时无法弥合的现实，亦不能成为亲日右派和反日右派彼此之间视为陌路，甚至互相攻讦的理由。至少，我们社会的民主化还需要这两方面共同去推动，要是由于在这个并非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弄得很僵，那么削弱了民主力量不说，又会给人以所谓民主派本身不懂民主，自由主义者连自己盟友的思想自由都缺乏必要尊重之口实。

所以，我建议，对于这方面的分歧，我们尽量采取各自宣传各自的观点为佳；如果一定要争论，也应在理解和尊重对方观点的前提下，尽量做到自我克制，让争论停留在理性地探讨的层面，多些展现些绅士、淑女的翩翩风度，别动辄大帽子和小鞋满天飞。

希望我们能够共勉。



千万不要在国内抵制日货!

异乡客

这些日子国内外华人群落间仿佛正在掀起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国人甚至把它看作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若有谁对此稍发表一下不同看法,立刻就会招致“无情”的打击.然而,即便如此,我也要冒一下这“天下之大不韪”,给列位“爱国志士”泼上一盆冷水,这在国内抵制日货可是万万不能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抵制日货”究竟抵制的是哪类日货?是指从日本进口的日货?抑或是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日货?或者两者皆有.

如果是指从日本进口的日货,那我们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下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情况.根据网上资料显示,近几年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呈现出某些新的态势,主要表现在:

1: 贸易额持续增长,2000年两国贸易首次达到8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7%;2002年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1019亿美元;2003年达1335.7亿美元.2000年至2003年的4年中两国贸易年均增长19.6%,今年1至8月两国贸易额达106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7%,虽然低于这一期间我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增长速度,但是增长率也属较高水平.

2: 贸易逆差不断增长.从近20年的中日贸易发展看,80年代基本是中方逆差,90年代中国有时逆差有时顺差,但是进入2000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中方统计中方是逆差,日方统计日方是逆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提供的资料来看,拿2003年两国贸易额1335.7亿美元作分析,其中日本向中国出口额是572.4亿美元,从中国进口额是751.9亿美元,日方逆差达179.5亿美元,2004年度的数据一时还无法查阅到,但估计还是呈现日方逆差,或基本等额.

再来看两国之间双边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纺织品、食品、矿产品、农产品(包括香菇,大蒜,蔺草)等,中国从日本主要进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光学设备、医疗仪器,电子产品等.从双方商品的结构而言,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则多为农产品、纺织品等可替代的消费品,而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机电、设备、高级原材料等生产必需品.

作一个通俗易懂的比较,假设现在中日双边贸易是等额的,那么简单的说,我们国家就是拿一些技术含量较低或极低的农产品、纺织品等生活消费品和日本换取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机电、设备等生产必需品,而中国又是个农业大国,增加农产品的出口渠道也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上,我们其实已经占得先机!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抵制日货了,先不说那些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机电、设备等生产必需品我们还得化更大的代价从欧美进口,至少我们抵制了日货,也得要考虑日本民

间同时也要抵制中国产品.那么这样一来,失去在贸易上我们已经占有的优势不说,有多少以日本订单为主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农产品生产企业)会濒临绝境!我认识一家宁波某县蔺草生产企业的老总,他们一个企业几百号人,就是纯粹靠日本的订单生活的,而这样类似的企业,在该县还有十几家之多.同样,浙江一个以香菇种植为主的贫困山区县,对日出口竟占了该县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几.

难道我们真的打算全民以香菇作主食,扔了席梦思,改睡塌塌米来拯救这些可怜的山区农民吗?!

所以说,在和日本的双边贸易上以抵制日货来和日本赌一把,我们的风险太大,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资本!!

那么如果我们抵制的是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日货,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只能说,后果很严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以来不遗余力的在鼓励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因为来了一家外资企业,就仿佛在草窝里下了一个金蛋,中国这么多开发区建设起来是为了什么?说穿了就是为了筑巢引凤,但遗憾的是,引来的凤还是太少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开发区土地抛荒和闲置.

一家外企在中国的投资,绝非只是解决几个中国人就业的问题,它涉及到土地的出让,厂房的建设,财政的收入.这就表明了我们国家不但在土地的地价上可以赚外商一笔(土地出让给外资的价格要远高于出让给内资企业),还可以在土建(厂房建设,配套工程)上赚外资一笔,另外还有每年的营业税,增值税等等一切苛捐杂税都可以摊到这家企业上去,再加上又能同时解决一批人的就业问题,多好的事啊!可以这么说,在外资企业还没有正常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经狠狠赚取了人家一大笔外汇,今后让它赚我们一些钱有什么不行?难道非要弄个鱼死网破不成?

我以前曾经参加过一些外企的扩初会审,一家中等规模的外企,投资额绝对少于不了3000万美元,而根据资料显示,现在在长三角投资的日资企业有9000多家,同志们!这里包含了多少外汇啊,多少税收啊!你们想过没有?!

好,现在我们去抵制日货,让它们无利可图,那很简单,他们就不来中国了,可以去台湾,去东南亚,甚至去印度,那边地价,税收也远比日本本国低廉啊!那我们不是在干一件天大的蠢事吗?放着先到手的外汇不赚,让给别人去赚,看着已经落巢的金凤凰飞走,还美其名曰:为了爱国!那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在中国经济急需外来新鲜血液的今天,在招商引资,筑巢引鸟日益重要的当下,我们居然还要打着爱国的名义去做亏本的买卖,不能说罪孽,但“无知”却是当仁不让的.

还有一点我想说说,现在有不少“爱国志士”在大呼要“抵制日货,振兴民族工业”,不知你们可否了解,我们国家现在不少所谓大牌民族企业,其生产线,其核心部件,又有几多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把日货抵制了,不也同时抵制了这些民族企业的精髓,没有了这些精髓,你让他们如何才能振兴到今天这个大好局面?所以,在喊口号的同时,我们也得用用脑子,光靠一腔热血是没得啥用的!!

当然,对身处国外的人来说,抵制日货运动完全可以进行下去,因为这和中国的利益相对牵涉较少.只要你们觉得这样做能出气,同志们!那就继续努力吧!!



我们为什么仇视日本？

bystander

据香港媒体报导，一间小学的校长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心血来潮，在学校里播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给小学生们上了一次非常“难忘”的爱国教育课。小小年纪的同学们，有很多都掩着脸不敢看那些残忍的镜头，有些更当场哭了起来。当记者问这位校长为什么要播出未经剪辑，血腥残暴的纪录片时，她的回答是：“为了要让同学们真实地了解日本人的凶残。”

看过纪录片後，也许孩童们看日本动画卡通时会觉得有点不是味儿；也许他们会少买一点日本进口的糖果和玩具。但是，我想来想去都不明白，这位用心良苦的校长要给同学们上这次爱国教育课，目的是否就是要冲击他们的幼小心灵，让他们产生不安、疑惑和矛盾的心理状态？我真的很想亲自去问问她，究竟她知不知道，这样做其实是向一群没有分析能力的小孩播种仇恨？究竟她向孩童们灌输反日意识时，有没有想清楚，要反对的“对象”究竟是当年的日本军人？是军国主义思想？所有日本文化？日本政府？还是她所说的“日本人”？

不错，“日本人”在上一个世纪真的杀了很多中国人。但是，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杀死的同胞，只会比日本人杀的中国人更多，残忍程度方面也不遑多让吧？不过中国人杀同胞的原因，就似乎远比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原因更要复杂，更难理解。今天看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无知小儿，此刻可能会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产生一种莫名的反感；但是，到有一天他们知道“中国人因自相残杀而死的人，比起死在日本军刀下的人还要多”的事实时，难道就不会因此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产生更大的反感么？那位小学校长不是有点儿太过短视了吗？

也许世间上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大家不妨冷静地想想，我们许许多多的“偏见”，究竟是从何而来？

一切挑起种族仇恨的言论和举动，长远而言必定弊大于利。客观而言，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双方有互利的的作用。去年中国跃升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给日本多年来呆滞不前的经济带来曙光。而日本厂商在中国投资，把生产线移到中国的工业重镇，亦有助解决内地严重的就业问题。再加上内地不少机械和电子产品的精密配件，例如微处理器，都要从日本进口，因此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中日双方都十分重要。任何可能导致贸易关系恶化的举措，只会对双方广大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

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就说过：“当货物不能在国与国之间流通时，战争便要爆发了。”（When goods don't cross borders, armies do.）难道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结果吗？

我们仇视日本人，与所谓“国仇家恨”大概没多大关系，也不是出于什么“客观的敌对形势”，反而与当权者采取的态度有关。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磨擦、纠纷或冲突

时，政客都不会反躬自省地问：“为什么人家对我们怀有敌意？”（Why do they hate us?）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客都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仇恨”更能把立场不同、想法不一的国民短暂地凝聚起来。政客都知道，群众积压的愤懑越大，就越容易被煽动，因为群众的特性就是对外国人充满疑心和抗拒；喜欢凑热闹、起哄、找替罪羊宣泄不满情绪。

中日两国的当权者都可能以为，只要掌握群众的这种特性，就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挣到更多政治本钱，巩固自己的实力。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非常短视的。日本的领导人自恃有美国撑腰，不断搞小动作，并刻意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固然是不顾长远利益的小人所为。但是我们的领导人也好不到哪里，故意纵容损害睦邻关系的群众运动，却没察觉到随时有“玩火自焚”的危险；相信以他们的水平，大概就只够资格当个不大称职的小学校长吧？！



日本加害国应成立组织，联合对付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混帐逻辑

马悲鸣

下面抄段《多维新闻》：

【日本官员：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世界庄严承诺

2005年4月17日23:16:53(京港台时间)

中央社4月18日电 /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中国媒体质问日本官员的焦点。日本外交部发言人高岛肇久4月17日晚对此表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为了让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

高岛晚间在北京向媒体说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会谈内容时表示，小泉首相已经表示会重新考虑，今後是否以适当的方序参拜靖国神社。

对于中国媒体质问「如果美国总统布什每年参拜在广岛丢下原子弹的人，日方觉得这只是个人感情吗？这是可以接受的吗？」高岛说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参拜战犯，而是参拜在二战当中不幸丧生的人，当然其中包括军人，也不仅是在广岛、长崎死去的日本国民。

高岛说，小泉纯一郎已反复强调，日本今天得以重建、得以享受现代的繁荣，要感谢那些在二战中死亡和作出牺牲的人民。同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向世界作出庄严的承诺，为了世界今後和平、明天更加美好。

至于中国媒体询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是否考虑到中国民众的感情？高岛表示，这是小泉首相个人的决定，这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问题，「我不好做评论」。】

我对接触过的日本平民相当好感，但他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逻辑竟如此混帐。

我曾质问《中国的靖国神社在哪里？》。有人回答，在毛主席纪念堂和遍布全国的烈士陵园。

但这还是没法和日本的靖国神社比。靖国神社供奉了近百年来所有能找得到的日本死国难者。有名单的写明姓名。无名单有人数的写明某年某月某地死多少人。其中包括两万九千名台籍日本兵和两万一千名韩籍日本兵。中国说抗日战争牺牲了多少烈士，除了个别安葬地的烈士陵园，其他都在哪里？

如果有历次战役和惨案的死难者名单和人数，何至于到今天还拿不出抗战死难者的准确数字来。朝鲜抗日义勇军和苏联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的烈士陵园在哪里呢？

我对日本纪念死国事者的精神是尊重的。但靖国神社供奉的上百万死国事者除了因偷袭珍珠港而招致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以外，其他几乎全是死于海外作战。人们不禁反问，这么多死于日本本土之外的人若非参加侵略战争，怎么会死？如果日本不偷袭珍

珠港，如何能招致轰炸？

当这些日本加害国的政府和人民指责日本首相参拜的靖国神社里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牌位时，日本政府解释说首相不是参拜战犯，而是参拜在二战当中不幸丧生的人。而这些人不也都是对外侵略战争的参加者吗？

日本政府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死国事者的态度应该是政府对他们谢罪。可代表政府的小泉纯一郎却反复强调，日本今天得以重建、得以享受现代的繁荣，要感谢那些在二战中死亡和作出牺牲的人民。同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向世界作出庄严的承诺，为了世界今後和平、明天更加美好。

「谢罪」和「感谢」不是同义语。「谢罪」是政府向被蒙蔽，被征调，被牺牲的人民道歉。「感谢」是感谢被蒙蔽，被征调，被牺牲的人民对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加害他国人民的忠勇。「谢罪」和「感谢」之间，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就没了，是非就完全颠倒了过来。

我在《日本右翼教科书和中国左翼教科书都不能说全错》里指出，最终导致中日开战的事件中，双方都有责任。但毕竟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都发生在中国领土之内，没有一起发生在日本列岛。从事件发生的地域上看日方就先天理亏。若是日军守在列岛的炮楼里，八路军端是不会去袭击。更何况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後，在南洋抢马来亚橡胶和印度尼西亚石油的太平洋战争中占领和攻击的国家，哪国人民向日本挑衅了？

小泉若是向世界作出庄严的承诺，为了世界今後和平、明天更加美好，本应效法德国总理向纳粹加害者纪念碑下跪那样，向受害国受害者谢罪，乞求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原谅。可日本首相既不向受害国死难者谢罪，也不向本国死难者谢罪，却用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序感谢本国死难者对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忠勇，这不是往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么？！

日本是个人情暧昧的国家。战败之前，横行霸道，四出侵略。战败之後，虽然不敢张狂，却是处心积虑地不认帐。日本北方四岛被苏联占领。日本人士去北海道海岸，遥望北方四岛感慨赋诗：望我北岛兮，不能收还。

可日本占领的钓鱼岛呢？钓鱼岛北边的冲绳县本属中国琉球。是被日本武力割去的。章太炎曾作诗怒指西太後“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钓鱼岛本在台湾和冲绳之间海域的台湾一侧，应属宜兰县。可每有非日本船只接近该岛，日方军舰都打着“日本领土不容侵犯”的大幅标语，冲撞拦截。

日本首相对内是政府的代表，对外是国家的代表。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对内是代表政府感谢死国事者对政府的忠勇，对外是向受害国伤口上撒盐。

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解释说“要感谢那些在二战中死亡和作出牺牲的人民”，却并无对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把他们牺牲掉的谢罪与道歉。

对受害国人民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外交部却解释成是“这是小泉首相个人的决定，这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问题，「我不好做评论」。”

小泉纯一郎卸任首相後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个人身分参拜靖国神社，就如任何日本平民去参拜一样。但他在首相任上的参拜，就绝不是个人内心世界的问题，而是代表日本，否认侵略的国家表态。

受害国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至今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日本政府却是一贯的

置若罔闻，继续参拜。看来各受害国有必要组织起来，成立日本东南亚加害国组织，向日本正序提出外交照会，声明：第一，任何日本阁员在任期间参拜靖国神社，都被视为否认战争责任和对所有受害国组织成员国的正序挑衅。第二，如果日本制造原子弹，都将被视为投掷目标为各原受害国。

各受害国应当互通声息，协助查找日本对各国的加害事实和证据。各国建立受害者纪念性建筑，以供日方人员公开谢罪之用。

我赞成中国民间抗议日本的合法非暴力示威，但反对从文革造反派到八九民运非法割据一脉相承的非法与打砸抢暴力行为。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都是亲华的，到中国开店的商号都是给中国人民提供就业机会的。

暴打亲华的日本留学生和砸日本商号只能向日本右翼证明他们所言不虚。真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混帐行为。



中日之间

春秋战国

在当代国与国关系，同利同欲则争，同利两欲则合，两利同欲则分，两利两欲则亲。如果说十几年之前，中日之间因为国际政治上相互需要，又以生产能力不同层次，而在经济上相为补充，所以在不同利益不同目标的前提下，达到一种亲切友好的合作关系。一切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安全问题也此基础上，可以有效的进行调和，自然可以说是“一衣带水”。

然而这十几年以来，中国发展快速，国力大为提高。特别是在经济上，各种产品无论是在价格上与质量上，都可以同日本产品一争高下，中日在经济领域自然从互通有无时期，进入了全面竞争阶段。

政治上，日本走出和平宪法的捆绑，不断的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前进，以求在亚洲平衡中国领导权的过程中，谋求政治领头雁的地位。又进一步的积极参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职位，这又同中国代理亚洲利益，领导亚洲未来欲求直接的形成对立。

军事上，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本来就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不断的加强，一旦摆脱二战的历史包袱，清理和平宪法的阻碍，对于中国未来的军事压力也在不断的强化。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人也的确以他们“东方专制主义”者思维模序，以侵华时代常用的手段，想要含糊过去以求蒙混过关。一方面以各种的资本、政治好处来收买中国政府，另一方面又死不认帐，来保持自己的脸面；再不然就是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台湾问题，想要分而治之。但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也明显不会因几位独裁者说过：以德报怨，一衣带水，世代友好的话，就会过期作废的。而是随着中国的国力上升，民权意识的觉醒，国家意识的强化，中国人对于那一段历史，以一个人类族群常态作了正常的评估。

因此，我们要明白现代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对于历史问题的清算，而其实上是对中国未来利益的争取。历史问题，在中日之间只不过是一个由头，其经济、政治、军事等国与国切实矛盾的背景才是中日之间的心结。

表面上，中日现在的矛盾是几个愤青的口号所引发的，但是这本质上是对亚洲未来领导权之争。谁来领导亚洲，至少是在东南亚、东北亚的领导权到底是要操控在谁手里，中日之争是其未来矛盾所擦出的火花。

从日本看来，中国在将来必然是他最为主要的市场，以日本人的精明并不是不能理解，而面对中国的日益巩固的经济，他们也不会只把其当成对手，商人的心理使他们认为中日经济成为一体，反而会让他们的利益得以保证。问题是现实中国的专制政治生态依旧，内部利益不能通过有效的体系加以协调，要求稳定的口号之下的不稳定因素存在，日本的政策必然不会同中国人走的太近。日本对于自己的政治、军事依赖美国的同

时，强化自我独立的心态也必然在中国这样的邻国前不断强化。除非中国或者分裂，或者民主化改造，进而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部结构之后，日本人可能有一个比较亲华的政策。

中国政治体制不改造成为现代的民主宪政政体，就永远是内部矛盾大于外部问题。不稳定也就是使得中国政府要以稳定内部为主要课题，对外交上的让步也因而会更多，日本多年以来，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中国，以及国际上得到了不少的好处。但也种中国为不稳定所影响的形态，也将永远要让日本感到不安，进而使日本不得不依赖于美国人，与中国的对抗也就在所难免。

中日之间的矛盾是深刻的，解决起来也是复杂的。但是因为同在亚洲，又是亚洲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两国之间最终还要合作起来的。但是这一切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治体制改造是不是成功，是平稳的过渡，还是动荡不安，再就是分裂分化，会对于这中日之间如何合作，起到决定作用。但是可以看到，中日之间近期的矛盾会不断的强化，这是为中日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矛盾所必然引发的。



中共到底要从“抗日”这头羊身上扒下几张皮来？

启明

最近，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又上演了一出脑缺氧後遗症般的闹剧，而这场所谓的民众闹事的背後明显是中共在指使和策划。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就是自己住了三辈子的房子被人扒了，你也不能上街示威抗议的，那是不可以的，没有中共的同意，别说上街游行，就是去天安门抬头多看几眼天，都会有麻烦。如此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没有中共暗中策划，是不可能的。网上，报纸，电台，政府发言人，。。。都在煽情，明显的，中共是企图通过民众上街闹事来左右两国外交的走向，来左右国内的政治气氛，来掩盖由于自己的腐败造成的执政危机。

有人会问了，如此高涨的“爱国热情”，怎么能说是闹剧呢？民运真是卖国贼！。。。首先声明，我不是民运，我也不认识任何民运的人，我甚至连民运中有哪些人都不知道也不关心，你千万别张冠李戴，抬举了我而委屈了别人。

这次民间反日的起因据说是：1。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2。日本首相持续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3。日本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4。日本企图占领中国的钓鱼岛。我说这次民间反日是闹剧，是因为如下几个判断：

1。日本侵略中国的事，确实是日本人在历史上的一大耻辱，所以日本人才不喜欢总提这种不愉快的事，也不愿意在课本里提自己的罪恶，因为所谓正面教育的本身就是扬善抑恶。历史事实是一回事，通过阐述历史事实而无意中过分地宣传了战争罪行，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再说了，日本的右派占日本人口的比例很小，并不是社会主流意识。日本又是个民主国家，国民说什么是他们的自由，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那样的让百姓闭嘴的权力。

其实，在抗日的事情上，中共是最没资格说三道四的，它不过是想打肿自己的脸来冒充胖子。想当初，中共就是中国内部最大的卖国贼，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共不是主动向当时的合法政府放弃自己的权力诉求和武装，而是变本加厉地打游击战，扒铁路，到处流窜，破坏中国的稳定，生产，和国民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在内部捣乱和呼应，日本人何能如此顺当地入侵中国？当时的中国政府又如何能如此积弱而不堪一击？内耗早已经把国民政府的财力、军力、人力耗尽了，中共是引狼入室的历史罪人。号称抗日的中共，在整个八年抗战中，除了积极地扩展自己的根据地外，消灭日本人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三年解放战争中共穷凶极恶地消灭了八百万中国自己的政府武装，而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全部也没消灭几万日军。彭德怀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持久战的真正意图，曾领导八路军大过一次百团大战，消灭了万把日军，结果却是他在中共集团内最大的历史污点，被毛泽东揪了一辈子。中共还和汪伪一样，曾私下和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私订协议，彼此默契、互不来真的，如果日本真的披露历史真相，中共的脸就没地方挂了。抗战结束後，中共从原来得不到五万人，发展到一亿人口的根据地，和上百万人的武装，难怪毛泽东要在三十多年後，亲口向来访的日本田中首相到谢呢？中共和侵华日

本都是中国的罪人，日本人怎么会向中共道歉呢？

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就没有中共日后的上台，大发国难财是中共，毛泽东都不忌讳这些，现在的中共的领导也就别再得了便宜卖乖了，冒充抗日英雄要日本人道歉了吧！整个抗日的八年期间，也没见中共像今天这么起劲地抗过日，装什么大个的呀？这不是闹剧是什么？

2.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是不对，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情，你改得了吗？可是在这事情上，全世界只有中共没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因为要说篡改历史，中共或中国统治者是全世界的典范和鼻祖！日本人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只有不到0.5%的学校在用，实在太小儿科了，而中共篡改的历史不仅100%地进了所有中国的大中小学教科书，而且还进了宪法，进了党章，进了中央电视台，进了字典，。。。那才是铺天盖地的谎言和对历史的公然歪曲。如果中共要开外国人抗议本国教科书内容的先河，中共以后就别干别的了，外交部改对外教育部得了。中共连自己屁股上的“党屎”都擦不干净，中共以自己的这种对历史的“唯吾主义”态度，它还有什么资格去对别人指手画脚瞎说八道呢？

3. 日本人在自己家里拜自己的民族英雄，也不行？毛泽东对很多民族来说，也是个恶魔般的人物，中国人不是照样把他做成腊肉，放在天安门广场供人鉴赏？也没见中国人敏感地把他藏起来呀？日本首相拜靖国神社，抗议是没错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也应该从中体会到自己的作为，应该言行一致，对人对己一样才说得过去吧？

4. 日本人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日本人的事，是联合国的事，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理性处理。是否能获得通过，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合乎程序的外交手段来运作。可这和砸日货有什莫关系？好像中国人以前买日货是因为爱日本？是在支持日本的经济建设？纯粹是愚昧透顶！中国人买日货，是因为这些日本货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使用价值，不是因为中国人爱日本！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把自己不吃米饭作为一种有效的威胁，企图获得自己要求！成熟起来吧，中国人！

5. 日本企图占领中国的领土钓鱼岛。钓鱼岛属于琉球和台湾岛屿链上的一个小岛，而中国所谓的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所有权，在大清白纸黑字地签了割让土地的马关条约后，这个所有权的历史就被中断了。中国人对该岛的所有权是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条约的产物，不是自古以来的事。而在二战中真正战胜了日本人的是美国人，这些国际条约也是美国人带领一众国家建立的，日本人也是接受了美国设定的投降条件的。这和中共压根就没什莫关系，中共挟二战之利，已白白地得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就别再得便宜卖乖了。否则一个在二战中，东躲西藏跟耗子似的乱挖地洞，或钻青纱帐的主，现在有什么身份出来要东要西的？从国际法理上看，如果中共不继承前政府的债务，条约，协议什么的，也就不应该继承前政府的领地和财产。孙文割满洲不算卖国，因为从他的共和国角度看，关外满清的东三省，压根就不是他的国家领土。中共既然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承担中华民国的任何债务和协议等，他凭什么出来宣称继承中华民国的领地和财产呢？这不是笑话吗？

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战后重建做了很多工作，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战胜国的心理和气度。而中共居然现在也舔着脸以战胜国的身份对日本喝三邀四的，就没觉的自己当时缺点什么吗？日本是向你投降的吗？

中共以前没真心抗过日，现在也没真心抗日！江泽民就是抗日期间在南京长大的，他的亲生父亲就是汪伪政权中的一个小官吏，在整个抗日期间，他躲在南京是风吹不

着雨淋不着的，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要不怎么吹拉弹唱无所不会呢。结果现在，他不仅能像全世界炫耀他的这点从日本人那得来的教育背景，还能颠颠地跑到日本去氯着个脸一本正经地教训日本人，反对日本政府的二战态度，这不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吗？中共不过是因为自己的腐败，遇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执政危机，所以才需要抗日，需要把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的腐败引导到国外去。

了解历史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共到底想从抗日这头羊身上扒下几张皮来？



了解一下日本民间的声音

东京博士

—
以下是一个经常与本人辩论各种中日话题的日本网民（3n岁）的发言，仅供参考—

■靖国神社

这个已经成为政治的道具了。对于我们一般市民来说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日本人对此关心程度也非常的稀薄。

为什么说是政治道具呢？因为选票可以成批的获得。因为有遗族会，拥有相当的选票，可以在选举方面期待，所以政治家们都挤着去参拜。这也可以说是选举的弊病（美国的来复枪协会也有类似之处）

但是，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来祭奠呢？现在被祭奠在靖国神社的人的大部分的遗族们都认为分开来祭奠也不错，或者主张搬出靖国神社也可。但是，由于甲级战犯的一部分遗族的猛烈反对，意见一直无法统一。还有过激的右翼的参与，我认为一般国民也就懒得再去管那些事了。

■日本战後的态度(败国?加害者?)

关于这一点，日本国内几乎都承认是「败战国」的立场。理由很简单，战争中，小学都在教育[鬼畜美兵]，因此都认为战争的对象国家被限定为美国。

当时的日本，与亚洲各国都在战争，还与欧洲战争，这一点在战後被遗漏了。因此，输掉战争的原因成了只是扔[原子弹]的美国，战後日本人对于战争的观念被固定在了[输给了美国]这种思想上。

美国在战後处理上非常成功地让日本国民接受了顺从，其方法就是[保存天皇制]。因此，此後的日本国民完全倾倒在了美国脚下。

实际上，日本的战後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虽然美国对日本倍加警戒，但是由于与旧苏联进入了冷战时期，美国做出了有效地利用日本才是上策，做了方针转换。这对于日本国民的经济发展也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更是对美国一边倒，因此造成了疏忽了对亚洲的战後处理和反省的结果。

■日本(日本人)为何要发动战争

关于这个，我也不知道。

如果能够询问当时军队的上层人物的话，我也想问问（战後已经都被处死，无法知道详细）

那么日本国民为何参加战争呢？

日本本来就是听从上边（相当于现在的官僚政客）的民族，上边说[干]，大家就一起干了。

进一步说，军部打出天皇的旗帜和爱国精神来鼓舞国民，大家都盲目地认为奔赴战场是正确的事。（至平安时代天皇掌握着政治的实权，也被神格化了，此後出现了武家社会，一直到明治，天皇便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到了昭和突然神格化复活也不是偶然的。）

当时如果说不想上战场的会被说成是[非国民]，一家人都会锒铛入狱，全凭宪兵的心情，还有被枪毙的。

因此，我没有美化战争的意图，在[爱国]的名义下，夺取了亚洲众多无辜的生命是事实，并且，大多数日本人也因为这些有[浪费死]的单词来说明这种愚蠢的结果。

我们日本人据于[败战国]的立场、有必要想起自己的「加害者」的立场也是不可否认的。

■日本人的爱国主义

现在的日本几乎不存在。有人使用稀薄化这个词，这是物质社会，个人的多样性的结果，[国家]这个概念模模糊糊了。

实际上，从小学到高中，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老师让学生[不要唱国歌，也不必起立]，一般生活中也几乎感觉不到国家这个概念。

特别感受到[啊，我们是日本人啊]时，也不过是最近才在日本流行的的足球国际比赛，这里说或许很滑稽，其他国家打击日本时，觉得一下子爱国主义过热的感觉。

最近感觉到越是遭受攻击越不[反省]地朝危险的爱国主义气氛发展（这个难道是与国民性直接有关而他国没有的？）

最近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发言也增加了，也被认为是这种背景（觉得国民的爱国主义高涨，对政治家来说是很好的支援）

写了很多，如果中国人能接受这些，那么再写一些。

现在日本国内的反应是对半。强硬派趁着势力有[援助了中国10兆日元的规模了，还这么说日本真不讲理]，还有[不，他们遭受了战争伤害、金钱援助是当然的，战争的道歉还应该用文书表示]。等等各种意见。

现在，安倍在国民中很有人气，有新闻说是下一届的首相选举候补，其实，对一般市民来说，他的人气也不过是因为上镜头，如果安倍成为首相，对周围各国强硬过头，日本很危险，我认为这是潜在的国民意见。

这次就写这些，或许有各种各样的批判意见，我谈政治很累，对不起了。。。。。

日语原文参考――

■靖国神社

これは、もう政治の道具ですね。

我々一般市民にとって直接生活に関わっていない事は、我々日本人は非常に関心が薄くなる性質があります。

なぜ政治の道具なのかというと、選挙での票が、まとまって入ってくるからですね。

遺族会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かなりのまとまった票が、選挙で期待できるので、政治家はこぞつて参拝するわけです。

選挙制度の弊害とも言えます(アメリカのライフル協会のようなものです)

では、なぜ分詞しないのかという理由ですが、靖国神社に祀られている人達の、遺族の方達の大半は、もう分詞しても良い、もしくは靖国神社から外してもらっても良いと言ってるようです。

しかし、A級戦犯の遺族の一部が、猛烈に抗議しているので話がまとまらないというのが現状のようです。

あと、過激な右翼の方達が関与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ので、一般国民は迂闊に話題にする事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日本の後の態度(敗国?加害者?)

これは、国内ではほぼ「敗戦国」という立場ですね。

理由は簡単で、戦時中、「鬼畜米兵」と小学校から教え込まれた為、戦争対象相手国が

「アメリカ」に限定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だと思われます。

当時日本は、アジア各国とも戦争を起こしてしまし、欧州とも戦争していたわけですが、

その点がすつぱりと戦後も抜け落ち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

したがって、戦争に負ける原因であった「原爆」を使ったアメリカに止めを刺されたという結果論になり、戦後の戦争に対する日本人の観念は「アメリカに負けた」という固定的なものになったのだと思われます。

アメリカが、戦后処理で当時上手く日本国民を納得、従順にさせたのが「天皇の存続」という方法でした。

これにより、日本国民は見事に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傾倒していくわけです。

実際は、日本の戦後の建て直しが、ものすごいスピードで進んだ為、アメリカは、日本に対して警戒感を持ったようですが、旧ソ連との冷戦時代の突入によって、日本の有効利用が得策と判断し、方策転換。

これが日本国民にとっても経済を発展させるのに都合が良かったのででしょう、更にアメリカに傾倒し、アジアに対しての戦后処理や反省の念を疎かにする結果にな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

■日本(日本人)はなぜ戦争を必要としたのか。

これは、私にもわかりません。

当時の軍上层部の方だけに詳しく聞けるなら、聞いてみたいところです。(既に戦后すぐに死刑にされた為詳しくは誰にもわかりません)

では、日本国民はなぜ戦争をしたのか。

日本は元来、お上(おかみ→現在の官僚とか政治家みたいなもの)の言う事を聞いてきた民族ですから、お上が「やれ」と言えばやったのででしょう。

更に、軍部が天皇を旗印に爱国精神を前面に出して国民を鼓舞したので、戦争に赴く事が正しい事であると妄信したのででしょう。(平安時代までは天皇は政治の実権を握り、神格化もされていましたが、その後、武家社会になった後は、明治に至るまで、名ばかりの置物であつたのが、昭和になって突然、神格化が復活したのも偶然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戦争に行きたくないと言った場合は「非国民」と言われ、一族郎党が牢屋行きか、宪兵の気分次第では、銃杀もあつた模様です。

だからといって、戦争を美化するつもりは無く、「爱国」の名の下に、アジアの多くの命を无残にも夺つた事は事実ですし、また、日本人の多くも、こんな言葉の為に「无駄死に」したというのはなんとも愚かな結末です。

我々日本人は「敗戦国」という立場はもとより、「加害国」としての立場も思い出す必要があるのは事実です。

■日本人のナショナリズム

これは、ほとんど無いのが現状です。

希薄化という言葉を使う人もいますが、物質社会になり、個人が多様性を得た結果、「国」という概念があやふやになっているのだと思われます。

実際、小学校から高校までの、入学序や終了序に、教師が生徒に対して「国歌を歌わないように、起立もしないように」と教えているようですから、一般生活で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を感じさせる事は無いです。

あえて「ああ、我々は日本人なんだ」と感じるのが、ここ最近日本でも流行っているサッカーの国際試合や、ここで言うのも変な話ですが、他の国から日本叩きをされた時に、一気にナショナリズムが急过热するという感じでしょうか。

叩かれれば叩かれるほど、「反省」ではなく危険なナショナリズムに進んでいく雰囲気を感じます。(これは国民性と、直接地続きで接している他国がない為でしょうか)

最近、靖国神社を参拝している政治家が、発言力を増しているのも、こういった背景があるものと思われれます。(国民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高揚は、強気の政治家にとって良い援護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と感じます)

色々長く書きましたが、中国の方達には納得いくも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それを承知で書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現在、日本国内の反応も五分五分です。

強硬派が勢いづいてきて、「10兆円規模の援助をしてるのだから、ここまで言われる筋合いはない」という意見や、

「いや、戦争で被害に遭わせてしまったのだから、お金は当然援助すべきだし、戦争の謝罪も文書でさらに示すべきだ」

と、様々な意見が出始めています。

現在、安倍氏が国民に人気があり、次の首相候補などと新聞では言われていますが、実際、一般市民にとって、この人気というのはTV映りが良いからという程度のもので、安倍氏が首相になった場合、周辺諸国に対して、強硬すぎて、日本はやばい事になるというのが、潜在的な国民の意見だと思えます。

今回、書いたことにより、もしかすると色々ご意見や批判もあるかとも思いますが、私は政治の話をするのが疲れていますので、書くだけになっ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その点、ご容赦ください。

